

#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4

1 9 7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修正主义企业管理 •

- 杀气腾腾的苏联劳动纪律……………黄 雄 ( 1 )
- 纪律的辩证法 ……………〔苏〕 A·多夫巴 ( 5 )
- 新厂长……………〔苏〕 M·奥夫恰罗夫 ( 7 )
- 只能按照法律 ……………〔苏〕 Ю·马赫陵 ( 12 )
- 被怀疑的休息 ……………〔苏〕 П·科里亚金 ( 16 )
- 劳动纪律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  
……………〔苏〕 A·皮亚塔科夫 ( 17 )
- 社会结构和管理的职能……………〔苏〕 沃尔科夫 ( 22 )

### • 所谓“茨洛宾工作法” •

- “茨洛宾工作法”的厄运……………黎 丽 ( 31 )
- 工作队是这样建设的 ……………〔苏〕 H·A·茨洛宾 ( 35 )
- 我们按茨洛宾工作法工作…〔苏〕 B·谢瓦斯季诺夫 ( 40 )
- 队核算制的新形式和工资的组成  
……………〔苏〕 B·阿兹别里等 ( 44 )
- 坚固的砌体 ……………〔苏〕 Ю·别德齐克 ( 50 )
- 谁破坏了合同?……………〔苏〕 A·库切列恩科 ( 53 )
- 茨洛宾工作法用于工业建筑…〔苏〕 П·索洛马季恩 ( 56 )
- 农村采用队包工制 ……………〔苏〕 H·安东诺夫 ( 58 )

茨洛宾工作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苏] M·波德克柳奇尼科夫 (59)

· 新老沙皇的扩张主义 ·

勃列日涅夫的嗜“沙”癖.....梁 锋 (61)

十九世纪中期的俄中关系

.....[苏] M·И·斯拉德科夫斯基 (63)

古西伯利亚.....[苏] A·O·奥克拉德尼科夫 (76)



细说清朝(节录).....黎东方 (82)

· 印度尼西亚社会问题 ·

于无声处听惊雷..... (109)

印度尼西亚.....[美] C·斯特林 (111)

现实改变了欢乐的情景.....[英] D·戴维斯 (127)

拴住企业老虎.....[英] D·科金 (131)

野心勃勃的提高生产率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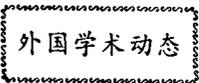
..... [英] R·哈略沃斯普特罗 (137)

寂静舞台上的“独脚戏”.....[英] D·科金 (142)

\* \* \*

俄国发现了麦迪逊大街.....[美]《商业周刊》(145)

更多的波兰人涌向私人经营.....[美] M·W·布朗 (149)



西方对苏联和东欧国家

的研究..... (153)

## 杀气腾腾的苏联劳动纪律

上海良工阀门厂青年工人 黄 雄

如果邓小平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得逞，我国劳动人民的命运将会怎样？要知道这一点，读一读本期选译的几篇透露今日苏联劳动人民苦况的文章，就可略见一斑。

看，那个新来的苏修厂长，走马上任，就把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技术人员踢出厂门，使他们“成为流浪者”。那个苏修的农庄主席，“醉心于行政大棒”，“私设法庭”，无故迫害农庄庄员。就连那个小小的苏修检查员，也可以任意闯入工人家门，因为没有见到司机执行值勤前必须“睡觉”的规定而“狠狠地训斥”，甚至可以下令司机“滚蛋”。再看看苏修那一套纪律制裁措施，更是杀气腾腾。谁如果在劳动中不“规规矩矩”，违反那个特权阶级的意志，就要“调去干低工资的工作，剥夺奖金，剥夺住房的权利”。这还不够，如果一班人中有一人违反了劳动纪律，那末，整个这一班人都要倒霉，“要为他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损失承担责任”。这跟封建皇朝搞的“一人有罪，九族遭殃”，跟蒋介石的“反共保甲连环保”有什么两样！

杀气腾腾的苏联劳动纪律，跟西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纪律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苏修更其恶劣，它还要在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上面，涂上一层又一层的油彩，欺骗世人。所谓《纪律的辩证法》、《社会结构和管理的职能》等文章，就

是这一类东西。

“既然尽快巩固劳动纪律是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我们就无权忽视任何一个有益的措施。”“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这是万万不能违抗的。工人要抽一支烟吗？不行！这违反“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必须扣工资、扣奖金。如果屡扣不改，那就得停职、开除。拿“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来吓唬人，说穿了，就是为了维护饥饿纪律和棍棒纪律，就是拚命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所谓“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只不过是套在无产阶级的锁链。在粉碎雇佣劳动制度，粉碎体现这种制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自然会按照本阶级利益的要求，建立起自觉的革命秩序和纪律，把社会生产推向前进。我们良工阀门厂也是现代化生产的工厂。但是，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广大工人受压，就是要违反修正主义的“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生产当然上不去。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工人把领导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按照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办事，生产很快就上去了。十年来，阀门的产量连翻三番，品种增加了五倍。这也证明，超阶级的“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没有的。苏修鼓吹这一套，无非是替那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提供蹩脚的理论根据罢了。

社会主义社会“既无剥削阶级，也无阶级对抗，管理工作就绝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意旨强加于另一个阶级”。这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替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所抹的一层主要涂料。他们首先把苏联说成是一个“芙蓉镇”：在那里，剥削阶级已经“消失”，阶级对抗“不再存在”。接着笔锋一转，企业管理当然也就“失去了阶级性”，奴役工人的雇佣劳动纪律当然也“不再可能存在”了。可是这么一来，却彻底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

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经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都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旧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存在，而且，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苏联的复辟，就是苏联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进行颠覆的结果。这个穷凶极恶的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就象一群饿狼，比老的资产阶级还要厉害。请看下面选译的报道，那些苏修厂长和农庄主席，不是把苏联工人农民看成“懒汉”，就是看做“贼”；因而他们手中总是拿着沙皇时代农奴主交给他们的鞭子，鞭打着苏联工人农民“好好劳动”。这些人还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至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他们办集中营，办“精神病院”，制定法律，组织“克格勃”……，用来对付苏联人民，其凶狠毒辣的程度，比之他们的下级官吏还要厉害千百倍，就可以想见了。

“管理工作不可能成为少数人谋求私利的表现”，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新厂长”普里霍季科可以任意开除工人，佩特罗维奇可以任意把农庄庄员当做“贼”，正是由于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工人农民的权力通通被剥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大谈什么“不可能为少数人谋私利”，这叫又要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厚颜无耻，莫此为甚！但是，苏修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确实太杀气腾腾了，各种华丽的辞藻也掩盖不住它那狰狞的面目。于是，这班御用文人只好有气无力地申明，它

“完全不是什么榨取血汗的制度”，拚命要跟西方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划界线，但却越划越糟，不打自招。“不是榨取血汗的制度”！苏修先生们，你们未免谦虚了。你们的血汗制度比起西方的血汗制度来，是更胜一筹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你们的血汗制度已“科学化”了，象什么“科学使我们懂得，不遵守秩序，任意闲逛，比以规定的速度工作，按规定的时间休息，更为使人感到乏力”等等，从生理学上证明血汗制度的“科学性”，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比不过你们的地方。

从苏修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看来，确实是“严”字当头的。他们贯彻这套纪律的班子也很“硬”。但是，这种“严”，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严重剥削的“严”。这种“硬”，不过是走资派对劳动人民软硬兼施的“硬”。今天，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我国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大叫大嚷的什么“整顿”，就是要把苏修那套修正主义“严”字当头的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把苏修那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硬”班子强加到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但是，中国不是苏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劳动人民，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给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

## 纪律的辩证法

〔苏〕A·多夫巴

工业生产中工作时间的丧失已在不断地减少。据统计，一九五〇年一个工人丧失的工作时间是四点六天，十年后为三点九天，到一九七〇年为二点九天。去年，已降低到二点二天。

但是很遗憾，这不是诗歌中所写的那种情况：“机灵的数字表达了意思的全部色彩”。相反，这些统计没有表达出更为重要的含义。一九七四年生产的工业品比一九五〇年增加八倍多。在这段时期内，一个工作日的价值提高了五倍多。因此，旷工、停工、请假虽已减少了一半，而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却增加了。

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劳动纪律教育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什么叫纪律教育？通常认为，应该采用对工人有直接作用的说服教育、表扬和处分；但这是很不够的。

纪律同规定劳动定额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因为产量定额（或者工时消耗定额）和科学劳动组织形式的其他因素一样，直接同人有关，同人的精神、物质利益有关。如果一个定额被工人超额百分之四十到七十，那末，这个定额就不会促使人们充分地利用工作时间，因为下班尚早，每日的工资额有保证。这样定额虽有了，但对工人的要求却体现不了。相反，有技术根据的定额就不会给工人留下闲逛、闲谈或者抽支烟休息一下的空余时间。

这里所指的完全不是什么榨取血汗的制度。科学使我们都懂得，不遵守秩序、任意闲逛，比以规定的速度工作、按规定的休息时间休息，更会使人感到乏力。

在一个不大的集体里，每个人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都要对其他同志负责。北方钢管厂的工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IO·斯米尔诺夫考虑到这一情况，建议作出这样的规定：只要有一个人违反了劳动纪律，整个工作队都要为所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承担责任。

应该学会在说服教育的同时，对那些不愿意尽力劳动的人运用权力。譬如说，大家知道，十个工作人员中，实际上有九个人从不旷工。如何对待那个破坏整个事业的人呢？法律规定有很严厉的制裁办法。但是很遗憾，许多企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客气地不采用这些办法。

在一些兄弟国家内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在波兰，旷工一次，年终奖金就至少要扣除百分之二十，旷工两次要扣除一半，旷工三次就不发年终奖金。工作人员自行停止执行合同，就丧失当年的休假权利，而且到新单位后，第一年的休假期要缩短。在捷克斯洛伐克，旷工一天，休假期就减少一至两天；如果是多次旷工，就要加倍扣除休假天数。在保加利亚，那些由于违反劳动纪律或者擅自停止生产而被解雇的人，到新单位后要拿一年的较低工资。

我认为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借鉴一些可取之处。

许多先进工人说得对，诚实的劳动者不害怕任何严厉的法律。既然尽快巩固劳动纪律是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我们就无权忽视任何一个有益的措施。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 忻彬译)

# 新 厂 长

〔苏〕 M·奥夫恰罗夫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来到了汽车拖拉机拖斗厂。由于这是一家不十分大的厂，因此，英诺肯季·格里戈里耶维奇刚迈过工厂大门的门坎，“新厂长来了”这个消息就立刻传遍了各车间和各科室。

对更换厂长这种事，厂里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当厂长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离职的原因也各有不同，而且不一定是自愿离开的。英诺肯季·格里戈里耶维奇·普里霍季科，算起来已经不知是第七位还是第八位厂长了。

全厂的人第一天就明白了：普里霍季科同他的前任不一样。普里霍季科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非常仔细地观看堆积着拖斗的极简单的平台，向工人、工长和车间主任们提了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过后，他回到办公室，把女秘书叫来，递给她一张纸。这是一张车间主任和部门领导人的名单，在每个人的名字旁边都写上准确的时间：十点二十分，十一点十五分，十二点……

女秘书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厂长解释道：“我明天要接见的人员和接见的的时间。请务必叫他们准时来。”

尽管都已预先通知了，有些人还是迟到了。他们是按习惯行事的。因此厂长没有接见他们。

“书呆子和官僚主义者！”一些人感到痛心。

另一些人说：“难道要求有秩序不好吗？听说他讲过这样的话：‘领导人的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不容许浪费时间，哪怕是一分钟。’”

总而言之，似乎发生了争论……

第二天，厂长叫来了生产主任西尼亚科夫。西尼亚科夫擦着额角上的汗，匆匆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厂长连一口气也不让他喘：

“为什么计划不能完成？”

“没有原料。”

厂长提高了嗓音：“废话。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西尼亚科夫顿时觉得血液涌上太阳穴。

他低声地说：“我……我想过办法。”

普里霍季科完全发怒了：“我不能代你工作！你是生产主任！一切要你承担责任。”

西尼亚科夫激动得两手发抖。他在厂里已经工作多年，在这里可算是老资格了。可是，以前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同他说过话。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说这话的恰恰是厂长。也许他是

对的，可是干吗大喊大嚷呢？如果同西尼亚科夫这次不客气的谈话，就象一件偶然的不值得注意的事一样，已不复存在，那末现在大约就不值得重提了。应当承认：这是常有的，某一个领导人动一下火，但是马上就会平息，而且会不止一次地懊悔，会在他没有善待的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

唉，普里霍季科的任性头几天就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最有趣的是：他谈的事常常倒是有益的，他下的指示也是有见识的，但是这一切他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调说的，以致使得一切都落

了空。他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把坏透了的懒汉和认真工作的人“一律看待”。普里霍季科经常下车间，说实在的，这样的巡视是有效的，可是有些人竟然害怕他的访问，去参加技术会议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将遭到严厉的斥责。

给人的印象是，新厂长似乎是两个人。头一个普里霍季科，是有一定学问的、善于思考的、富有主动精神的、精力充沛的工程师。他昼夜都在厂里，并严格要求部下把全部精力贡献出来，就象他要求自己把全部精力拿出来一样。厂长紧紧地抓住纪律（他说：“我们要严惩那些懒汉、旷工者和酗酒者。”），坚决地在各个车间推广机械化和自动化，用现代化的装配流水线替代那种落后的低效率的装配平台。甚至连仇视厂长的人也承认，厂里吹起了清新的转变之风。看来，新厂长正是厂里所盼望的那个人……

但是，在头一个普里霍季科背后，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形貌同他相似的人处处跟着。此人粗暴，缺乏自制力，不懂人情，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总是使人不好受。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个形貌相似的人几乎把头一个普里霍季科所做的有益的事一笔勾销了。

科学技术革命向领导人提出了新的高要求。是的，毫无疑问，领导人首先应当做一个博学的专家，他的手应始终按着时代的脉搏。但其他也同样重要，例如，领导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他管理生产，可不是按电子计算机的键钮——他的周围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求人家理解他们，要求人家对他们持应有的尊敬态度。

可你瞧，新厂长做事大刀阔斧；他说，哪有什么客气，工厂毕竟是工厂，而高指标全都会记录下来。但是会记录下来吗？大概最令人伤心的是，厂长的激动在各个车间里引起了反响。有

一个铰链工，是车间委员会委员，两年半内完成了个人五年计划，他对我说：

“您见过我们的车间主任吗？我早就了解他——性格稳重，待人公道。可是，得啦吧，新厂长来了之后怎么了呢？他从调度室回来——变得不认人了：忧郁，容易动怒。在这种时刻请不要走近他……”

集体的情绪低落了。人们开始离开工厂。厂长不加思索地在他们的申请书上签了字：“就是说，不愿意工作啦。”当然，这是些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至于那些简直毫无用处的人，不但厂长不觉得可惜，而且以后谁也不会觉得可惜。但是，在离职的人中间，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工程师、技师、设计师和工人，这可是主要的。

维塔利·伊凡诺维奇·瓦西利耶夫在工厂里从辅助电焊工升到总工艺师。以前他一切都很顺利，而现在跟新厂长却发生了不和。无论哪一天，都发生吵嘴……一有什么事，普里霍季科就大发雷霆：“您不配当总工艺师，您知道您该当什么吗？”瓦西利耶夫走了……连最老的设计师列昂尼德·帕夫洛维奇·阿尼克耶夫也走了……最后，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西尼亚科夫也走了。当然，他也不是自愿走的，不过，却是因为被提升为邻厂的厂长而走的。总而言之，走的人好象愈来愈多，而西尼亚科夫在和我交谈中有点忧郁地摇了摇头：

“是的，算啦，有什么好回忆的……只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对我来说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工厂……”

在会见时，该厂过去的工人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谢尔格耶夫对我说了大致相同的话。要知道，厂里的自动焊接至今还起着作用——这是他的功劳，是他把自动焊接运用于生产的。

发生了这样的事：谢尔格耶夫由于健康状况，请求调往另

一个车间。医生们也是这样建议的。于是，电焊工去找厂长。普里霍季科疲惫地看了谢尔格耶夫一眼，漫不经心地听他说话。而办公室里电话铃又响个不停，厂长时常分心。谢尔格耶夫心里想：“他有工夫顾我吗？”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委屈地说：“我也许该走了吧。”

厂长含糊其辞地回答：“好，好。”

过了几天，谢尔格耶夫写了离职申请书，把它交给女秘书。女秘书到厂长那儿去了。谢尔格耶夫心里还抱着某种希望：也许，现在普里霍季科会请他去，好好地听他说吧？门吱扭响了一下，女秘书把已经签过字的申请书递给谢尔格耶夫。一小时之后，谢尔格耶夫得到了一张离职证明书——他平生第一次成为“流浪者”，觉得眼泪蒙住了眼睛……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苏联《消息报》  
朱文娥译）

## 只能按照法律

〔苏〕Ю·马赫陵

努力工作、热爱土地并对集体农庄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佩特罗维奇，本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主席，但是他没有……

五年前，人们选基洛夫集体农庄的兽医佩特罗维奇担任了农庄主席。大多数人对他强调秩序、极端的严厉和渊博的农业知识很欣赏。农庄也正好需要这样的主席。

前任主席向佩特罗维奇移交时，客气点说，农庄的情况不是最妙。使新的主席感到愤怒的不仅是经济指标低，更重要的是劳动纪律极差，酗酒、盗窃公共财产的事不断发生，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给农庄造成了巨大损失。佩特罗维奇意识到：必须坚决打破这类“秩序”。

人们马上觉察到：新主席的眼光十分敏锐，什么都逃不过他。有些队长、工段长、高级专家对这种或那种不守秩序的现象都无动于衷、习以为常了。佩特罗维奇却不是这种人。他从不放过哪怕是一点小小的错误，也不饶恕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有一次，佩特罗维奇驾着车子行驶在田间宽道上。他赶上了一位母亲和女儿……她们请求搭车回村去。主席把车子停了下来，但他不是因为她们要搭车，而是看到了她们手里捧着一包甜菜，心里充满了愤怒。这妇女一下子还不明白，为什么那时佩特罗维奇如此愤怒？正如大家所说：面色大变。妇女开始辩

解：“一共只拿了五棵！”佩特罗维奇夺下了赃物，开始训斥女庄员，使她羞愧得无地容身。

“五棵加五棵——就是十棵。今天十棵，明天，……我说的不仅是拿几棵的问题，……你给女儿做出了什么榜样？她连数数还没学会，你已经在教育她：拿吧！集体农庄的东西，没关系！”

哎呀，这样的事主席碰到可多啦，简直伤透了他的脑筋！有的人擅自用马车把割下的麦草运走，有的人整袋整袋地把打麦场上的麦子拿走，还有的人费力地拖走配好的饲料或青饲料。……小工厂运来了金属配件——金属配件不见了。报废了的拖拉机拖斗底板送到小工厂，准备为女挤奶员造亭子——拖车底板失踪了。

还有，在畜牧场里，由于饲养员、畜牧技术人员和队长的过失，发生了牲口大批死亡的事故。

是的，看到这一切，使主席热爱集体的心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正义的愤怒。这时，佩特罗维奇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样，基洛夫集体农庄前任主席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必须坚决消除败坏村庄名誉和给它造成不小的物质上和巨大的精神上损失的现象。必须采取正确、可靠、有效的手段。什么样的手段呢？

照理，主席手里有许多同各种违法现象作斗争的方法。法律规定：对农庄造成的物质损失必须予以赔偿；调去干低工资的工作；剥夺奖金；剥夺登记住房的权利等等。道德感化对玩忽职责者的威力也很大；生产队、牧场、村庄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教育人的民主方法是农庄制度的基础，它同命令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最后，农业领导人在同盗窃公共财产的盗贼，在同那些给农庄造成物质损失的人的斗争中还有着忠实的同盟者——民警和

司法机关。

然而，佩特罗维奇忽视了用这些合法的手段来感化那些损人利己和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他竟然不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而是私设法庭，根据自己的看法作出判决。他的看法就是：即使违反法律也要严厉地惩罚每个人，这样才能吓唬人，使人望而生畏。

还记得不见了金属配件那件事吗？佩特罗维奇知道了这件事后，叫来了两个有盗窃嫌疑的庄员，立刻进行了非法审判。“贼！”——他向大家宣布说。仅就这一件事而论，主席已经粗暴地破坏了法律，因为按照法律只有人民法庭，而且只有法庭才有权给公民判罪。先于法庭或者不通过法庭，任何人都不能判定一个公民有罪，不管事实是多么确实。

法律规定了审理案件的严格程序。法律是英明而又慎重，关心备至而又至高无上的。因此，双方的辩论极重要，要求证据，证据！佩特罗维奇轻率地判了两个庄员犯有盗窃金属配件罪，并决定向他们追偿二百多卢布。但是，不久却捉到了真正的盗窃犯……

向无辜的受害者退回了非法扣除的钱。这样，物质损失是偿还了，但要知道，苏维埃公民的名誉和尊严却受到了损害！

在拖拉机拖斗底板的失窃案中，正直的波波夫在精神上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当佩特罗维奇一知道拖斗底板失踪，就宣布波波夫是贼，并解除了他的小工厂主任的职务，还从他的工资里扣除了一百五十卢布。接着，佩特罗维奇命令总工程师搜查了一些人，后者也这样做了（虽然很清楚：只有得到监察员同意的专门被授权的人，并有证人在场时，才有权采取这种行动）。工程师在一个庄员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底板。但是，甚至在这以后还不撤销对波波夫的判决，任意扣留的钱没有归还，也没有恢复

工作。

主席在处罚人时，一次也没想过：“我这样做对别人的利益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点，共产党员波波夫不久前曾提醒过：

“对我是莫大的耻辱！女儿流着泪走到我跟前，轻轻地问：是吗？爸爸，难道你真的偷了？一年来我总是绕道经过管理处。为此，我至今还感到痛心……”

农庄管理委员会会议变成了法庭，每次开会都对十至二十人作出现金扣款的决定。数额在三十至二百五十卢布之间。近两年来总共有二百四十人受到了这样的处分。

我们知道，佩特罗维奇的观点并不新鲜。从前有过，今天还常可从其他一些农业领导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捍卫者那里听到。如果听信这些人的话，那末惩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效：惩罚要严厉、迅速，甚至不惜违法。“这样，教育的作用就大啦！”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王建国译）

## 被怀疑的休息

〔苏〕И·科里亚金

电气列车的副司机必须在晚上六点钟以前去上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开车的时候保持充分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他总是早早地吃午饭就躺下睡觉。这一天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起床,准备去上班。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主人说:“请进来!”

机车库的检查员出现在房门口。他没有问好就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为什么不睡觉?!谁给你违反条例的权力?!”

副司机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刚刚睡醒。”

检查员吼道:“撒谎!你有什么证据?”

被怀疑违反条例的铁路员工抱怨说:“这还需要什么证明呢?如果说睡过了,就是睡过了。而且我的孩子还可以证明。”

“小孩子不能作证!”检查员一边回答,一边在自己的检查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开完车回来,没有出任何事故。机车库副主任召开业务会议,只是因为检查员没有碰到这个副司机在睡觉,就将他作为故意违反纪律的人而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副主任说:“你们人太多了,我们无法看着每个人睡觉。因此,今后我们将采用抽查的方法。我们有言在先:如果谁不遵守条例在家里睡觉,就叫他滚蛋!”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苏联《消息报》 房树译)

## 劳动纪律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

〔苏〕A·皮亚塔科夫<sup>①</sup>

培养工作人员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尽一切可能加强纪律,提高他们对执行其劳动职责应负的责任,这一切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科学技术进步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不仅对工作人员的专门技能,而且对劳动纪律性和组织性都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否则,我们就简直无法解决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大量极为复杂的任务。由此可见,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对挖掘巨大潜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苏共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书曾经号召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潜力,特别强调指出,不断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停工时间,节约劳动时间,更有效地使用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同提高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还指出,目前仍然发生着不少造成损失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干部的流动性也很大。要把所有劳动集体的纪律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按照示范条例的规定,每个工作人员对劳动必须采取踏实、认真的态度,必须及时地认真执行行政领导的命令和指定的任务,完成生产定额和工作定额,全部工作时间用于生产劳动,遵守技术操作规程,避免在劳动中出废品等等。但是现在已不能

---

<sup>①</sup> 作者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法学家。

仅仅局限于履行这些职责,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对劳动纪律的要求还应包括:提高职工对工作应负的责任,扩大他们创造性和建设性活动的范围,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更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

由此,内务示范条例制订了一整套工作人员的新的职责,其中包括工作人员必须安排好自己的劳动,以便超额完成定额和改进产品质量;必须敢于揭露缺点,主动地采取措施来消除那些阻碍劳动集体的工作或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和条件;工作人员必须品行端正,遵守社会主义共同生活的规则;不做妨碍其他工作人员的事;爱护企业的财物。还必须加以强调的职工的职责是要系统地提高本职的业务(生产)技能。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发生的生产技术革新,都要求不断充实和提高基本理论修养和专业基础知识。如果工作人员不提高本身的业务技能而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时,行政领导有权调动他的工作,如本人不同意调动,那末行政领导就有权把他解职。

许多文件对职工的职责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如行政领导根据本部门的规章订出并经厂工会同意的内务条例以及工人的工资技术等级手册、职员的技术等级手册、工作细则和条例等。这些文件所规定的全部职责连同工作制度,就是企业、组织和机关的内务条例。参加工作的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应该把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规章看成自己应尽的义务。生产集体必须努力使这些要求不致流于形式。经验证明:哪里行政领导、社会组织和集体的全体成员能够同心协力,那里加强纪律的工作就能取得良好的成果。在一个坚强、团结的生产集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建立在严格的要求和高度原则性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的集体才能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展开有效的斗争。

很多企业,由于个别同志的过失,影响到社会主义竞赛中自

愿承担的义务,因而丧失了获得竞赛第一名的光荣称号,最后失去了奖金。特别是那些采用集体工资制度的工作队,只要队里有一个成员破坏了劳动纪律或生产纪律,就会影响到整个队的劳动成果,影响到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

因此,领导人员作为生产的组织者,他们的作用以及他们对劳动纪律所负的责任都提高了。他们必须关心,怎样使自己所在劳动集体的工作条件有助于遵守秩序和纪律。为此,行政领导应该采取措施,不断改进计划,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组织劳动和生产。通过采用科技成就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保证劳动所需的健康和安全条件,坚决遵守劳动法和劳动保护规程。行政领导要组织好提高业务技能方面的工作,支持劳动者参加社会工作的积极性和参加生产管理的各种形式,关心改进劳动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按照内务示范条例,车间主任、工段长、工长或其他领导必须把每个工作人员固定在一定的工作地点,根据劳动合同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范围或工作范围,按时交代任务,保证机器、车床、设备处于良好状态,提供技术文件,及时供应材料和工作必需的工具,监督工作完成情况,等等。

苏共中央于一九七二年通过的“关于减少劳动时间的损失和消除违反职工劳动、休息制度的现象的措施”的决议中指出:行政领导容忍旷工、迟到、经常提前下班等现象,违法加班,慷慨地批准工作人员不保留工资的休假(往往无正当理由)等等,因而破坏了工作时间的制度,给正确组织生产和提高生产效能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妨碍了纪律的加强。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首先必须采用各种说服的办法。以社会主义法纪、劳动法、加强纪律、反对旷工酗酒措施等为题的讲课、报告、文章、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的种种宣传形式是培养

高度自觉的纪律性和防止破坏事件的重要形式。企业可以根据本单位遵守纪律的情况、活动条件以及潜在力量,把上述措施列入自己的社会发展计划中。在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和以优秀工作者的榜样进行纪律教育时,大量发行的书刊和编辑墙报(如材料能做到及时公布,并围绕某一专题则更好),起着重大的作用。

很多企业把有关加强纪律和建立稳固的生产集体的一整套措施都订在社会发展计划中,这样,所属各部门能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和实际的可能性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工作。

任何一个集体在加强劳动纪律的经常性工作中,必须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不仅用一切方法鼓励诚挚的劳动者的努力,并同个别成员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授予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民族友谊”勋章的讲话中提到:“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懒汉、出废品的人、酗酒者、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如果说服无效,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这样做是正确的,这符合我国社会和我国人民的利益,因而一定会得到全体正直的劳动者的赞许。”

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本人的过错而没有完成(或完成得不适当)劳动职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称为破坏劳动纪律或者称为违反纪律。凡是破坏劳动纪律,按照内务条例的规定,照例必须追究犯过错的工作人员应负的纪律责任,即予以纪律处分或采取社会感化的措施。劳动法基本原则(第一章第五十六款)列举了供行政领导采用的各种纪律处分的措施:谴责、警告、严重警告、调任低工资工作或降职(都不超过三个月),对于过去屡次受过纪律处分或社会处分而现在仍然一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或者对无故旷工的人,可予以开除处分。开除处分须经得厂工会的同意。

法律订出一系列保障,以保证处分的正确性。行政领导有

权采取的纪律处分，只以法律条款所规定的为限。企业、机关、组织的领导以及经部或局批准的负责人员有权作出处分。通常副经理、车间主任、科长及其他部门负责人、工长都拥有这种权力。纪律处分须在发现违反纪律事件之后及时作出，最迟不得超过一个月（不包括工作人员患病或休假的时间）。如果破坏行为不是一下子就发现的，那末务必自破坏行为发生时起的六个月内作出处分。事先要违反纪律者作解释（无论口头或书面形式），然后仔细核实违反纪律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如本人拒绝解释，这并不影响作出处分。每破坏一次劳动纪律，只能给以一次处分。在作处分决定时，要考虑到所犯过失的严重性、犯罪的程度、违反纪律的客观情况、他的身份、以往的劳动情况和品行。还须考虑企业里劳动纪律的现状及其违法现象的普遍性，因为处分对其他职工也都有教育的意义。

纪律处分可以采用命令或指令的方式公布，三天之内通知违反纪律的工作人员，并须取得收条。命令须说明理由，简单扼要地讲明过错的实质，对工作人员的错误行为作出评定，明确说明应受的处分。命令要传达到其他工作人员，只有这样，处分才能对违反纪律者以及劳动集体中的其他成员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

在惩戒工作中必须贯彻合理性。不管工作人员是初犯还是重犯，只是因为错误情况相同，行政领导一律给予相同的处分，这是不正确的。给以怎样的处分，这还得看某一破坏纪律行为在该企业、机关、组织中的普遍性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第五期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  
劳修齐、卫一译）

## 社会结构和管理的职能

〔苏〕沃尔科夫

管理工作是任何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必具特征。有必要即时指出,人们的管理活动一方面是生产力发挥职能作用(包括投入技术过程的人类活动在内)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又是对生产和一切人与人之间所有其他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工作的一种表现。第一种可以称为技术管理,第二种可以称为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在外表上表现为特定的机构系统的活动,在本质上它是任何一个组织形式所特有的社会关系体系的成分之一,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怎样(也就是说,由哪些集团的人来统治,他们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何),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本质,取决于统治社会的那些关系(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关系)。

在剥削社会中,社会管理制度在其根本性质上是阶级统治的一种表现,它在国家制度中找到终极的形式和最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社会生产的组织中,从而也就是在全部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所起的特定作用(管理者或是执行者的作用)是阶级的组织形式的标志之一。它和这些标志中最基本的一个标志(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占有生产资料并在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社会上实行管理和发号施令,可以直接进行(在企业中和在整个社会规模上都是一样,通过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分子来实现),也可以雇用一些人来进行。后者当然

是要去实现他们所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意旨的——也就是说，要实现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同一个统治阶级的意旨。这一点既适用于私有部门的职员，也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员，因为我们知道，后者的活动也是由组织为国家形式的同一个资产阶级所支配的。当然，在直接进行生产的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活动大部分是纯属生产技术性的指示。但是，这当中也交织着社会管理职能的执行，包括实现生产资料的主人的意旨和迫使劳动人民服从于这种敌对的意旨。于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剥削社会中的管理关系，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这类社会中社会结构的本质的阶级对抗的一种表现。

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管理制度在外表上是和以前组织形式中的那些制度相似的：管理通过国家形式而实现；有一个特殊阶层的人专门从事于分别执行各种管理职能。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正是这一点使得反共理论家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有可能制造上述的谎言。事实上，无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关如何组成和如何行事，也不论在外表上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管理机关如何相似，管理工作和管理关系的本质却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绝不相同的特性，因为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定性质所限定的。在这里既无剥削阶级，也无阶级对抗，管理工作就绝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意旨强加于另一个阶级。因为劳动群众是社会的财产的支配者，是经济中唯一的主人，因此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的主人。从而也只有他们，即形成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包罗一切的社会统一体的劳动群众，才可能承担起管理社会的职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专门从事于执行管理职能的那些人的特殊阶层的性质是怎样的呢？他们和劳动群众的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和在任何社会中一样，这个

阶层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是为了社会上的生产的占有者的利益而管理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占有者就是由劳动人民所组成的整个社会。在管理活动的某些特定的表现中,劳动群众的整体利益可能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得程度大些,另一些情况下则又表现得小些,比较不正确些(这时,我们称之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的表现),那是另一回事。然而一般说来,在根本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本身所产生的结果,管理工作不可能成为少数人谋求私利的表现,不可能把他们的意旨强加于社会其他成员头上。它只能或多或少是整个社会的意旨和利益的一种确切表现。而且专门从事于执行相应职能的人也只可能是劳动人民的一个阶层(除了劳动人民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再说,他们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象在剥削社会中那样表现为对抗,而仅仅表现为劳动人民的不同集团之间的社会差别。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分工的性质,这种差别还很显著,这一点确是事实。并且这里面也存在着管理活动未能十分确切地表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可能性,即官僚主义等的可能性。

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尤其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在以这个阶层为一方和以体力劳动者为另一方的这两者之间,仍然有本质差别,这些差别正随着共产主义的建设而在逐渐消失。但是我们认为,人们通常对于这些差别(从而也是对于如何克服它们的问题)考虑得太片面,依据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一个传统:把每件事情都仅仅归结为在各个范畴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中脑力成分和体力成分比例的差别,和相应地归结为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差别。然而这样看待问题实际上是把脑力劳动者的范畴限于只包括生产技术知识分子(技术科学部门的研究人员在内),并且也只考虑到了他们

那些与物质产品生产直接相关的职能。确实，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在考虑脑力劳动者文化发展的情况，比如他们已习惯于艺术创作等。这意味着艺术创作的特定性质已被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脑力劳动来考虑，从而也就是脑力劳动者中的一个范畴——艺术知识分子——的特定性质。联系到这一点，早就应该注意到脑力劳动中包括着好几种不同的活动类型，包括着社会劳动的各种各样职能这一个事实了。要了解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各种社会差别消除的过程和具有社会同质性的社会形成的过程，这一点是极其必要的。

在生产活动中，有些脑力和体力的成分已经统一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那些体力劳动者和生产知识分子之间的现有差别正在消除之中，但是无论这种情况多么重要，它还是不能把关于所有脑力劳动者的差别的消除问题全部无遗地都包括进去。

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特定形式的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它的特殊性质在于，从前的阶级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分工方式的残余仍然继续保留着。社会上劳动的各种不同职能仍然是不平衡和不同质地分布于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中。一种职能主要或者全部由一个社会集团来完成，另一种则由另一个集团来完成，如此类推。当然，和剥削的组织形式相反，这一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的垄断和阶级特权毫不相干的，因此，从前的分工类型的一些为害更大的表现在这里是被消灭了。

脑力劳动的职能，至少是由一个特定的阶层，即知识分子来完成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一个阶层之内，就脑力劳动的各种职能本身是异质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分出各种不同的范畴来，其中包括上面提到过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和艺术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范畴。再说，社会差别不仅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和体力劳动者之

间，也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即存在于知识分子的不同范畴之间，这就好象在各工人范畴和各集体农民范畴之间有阶级内部差别一样。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内部差别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毫不逊于阶级之间的差别。

社会主义时期脑力劳动者的范畴之一是由那些执行管理职能的人所组成的。这个集团在数量上占脑力劳动者总数中的大部分，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其绝对人数不仅不是降低，而且还在增长。一九四一年，这个集团的人数为五百五十一万五千人，一九五八年为五百五十七万九千人，而一九六〇年则为五百七十五万三千人。<sup>①</sup>

后来几年没有发表过统计数字，不过，分析一下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关于该共和国的统计报告，可以看出这一范畴的人数仍保持增长趋势。

从财政和其他纯属实际打算的观点着眼，完全应当盘算一下这个人数及其增长是否符合客观需要，以及是否有缩小行政管理机构等的可能性。然而，首先，通过对社会需要及其发展的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很清楚，对不必要的管理单位不管怎样压缩，这类人员的绝对数字却无论如何无法降低。其次，无论这个集团的人数多少，并不影响对它的社会性质的评价。它不是某种特别的阶级，因为就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言，它是同其他劳动群众集团（包括它是其中一部分的整个脑力劳动者阶层）居于同等地位的。因此，从社会角度看，问题不在于数字的变化，而在于这一集团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其他集团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同质性的形成过程中会发生哪些内在的变化。显然，为了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行政管理人员地位的特性

---

<sup>①</sup> 《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手册》，莫斯科，1961年版，第644页。

质，一般地指出整个这些人的地位仅仅限于他们是属于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并且，他们作为脑力劳动者，又一般地本质上有别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还是很不够的。这一种类型的脑力劳动的特定性质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首先包含着管理工作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职能——正如其他范畴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在执行不同社会职能时“专门化”的各种类型脑力劳动的特定性质有联系一样。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总的差别范围内(虽然它已失去对抗性质，并正在逐渐消除)，行政管理活动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不仅和工人农民比，而且和其他脑力劳动者的大范畴比，都显出还有某些特定的差别。

执行行政管理职能必须先要有权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对别人有约束力，并于必要时有权采用强制手段使其决定付诸实行。不难看出，和那些不具有这样权利的人员范畴相比较，这一点构成了管理人员作用的一个非常显著突出的特点。很难说，这种差别，比如说，比劳动活动中脑力成分和体力成分相对分量的差别的重要性要小些。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实例，它表明了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社会阶层内部各别范畴之间的差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

让我们把我国社会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社会阶层和下面这几个脑力劳动者范畴比较一下：(1)不执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技术以及其他类似工作的人员)；(2)生产管理机构的工程技术人员(车间主任、厂长、工厂管理人员和高级经济管理机关中的人员)；(3)与生产不直接有关的国家行政政治管理机关中的人员。显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和上述每一个集团之间都有差别，其消灭过程由于每一集团现在地位的特殊性，表现出独特的特点来。决不能把这里的每件事情都

只归结为在直接生产活动中的脑力成分和体力成分的结合。

一个没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工程师或技术员的劳动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尽管大有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者都直接参加物质产品的创造。消灭他们之间在劳动性质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的现存差别,实际上就是生产性质的一种改变,也就是使脑力的和体力活动的成分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在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中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管理活动,即使是同生产有联系时(经济管理),也不仅包含直接参与创造物质产品的技术过程的成分,而且也包含不是直接参与这一过程的成分,在行政政治管理领域中,它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所以,任何的技术发展或生产性质的变化本身,都不能使管理劳动那样的特定类型的脑力劳动和其他类型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现存差别消灭。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要求在所有上述社会集团(以及我们没有提到的集团)现有的全体劳动群众的活动中,把直接生产劳动和管理劳动有机地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必须使每个人都养成管理社会事务的习惯。

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从事执行管理职能的特殊阶层的人,这就是说,虽然在原则上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职能的承担者,而实际上并非所有劳动人民都程度相等地参与这一职能。有些人参加管理的程度大些,有些人小些,还有些人,甚至这就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然而后一种人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决不带有阶级对抗性质;在一个把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整体的结构中,所有的差别不过是劳动人民各种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过渡中,就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的这种社会差别(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差别)的重要性质也克服掉。所有劳动群众都普遍和经常地参加了社会事务的管理,管理机构的工作就会象苏共党纲中

所说的那样,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了。

然而我们认为,由于社会成员在执行管理职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们之间在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还是会保留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别的。这是和这一事实相联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永远都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员(首先是主管人员),对他们来说,管理工作必然会是他们的基本活动。但是还必须分清生产管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即技术管理和社会管理(作出有关集体的生活活动的重大决定,维持劳动纪律)。而可以由每一集体中的成员普遍参加来实现的,恰恰是后一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主管人员的作用等于是一个有权威的组  
织专家,他的劳动有机地交织在劳动集体创造物质或文化产品的总的过程中,也交织在集体性的管理活动中。只有技术管理工作仍然是“个人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参与执行管理职能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将存在,不过这些只能说是无关紧要的差别。

我们知道,在吸收群众参加管理这方面,尤其是在生产管理上,即使在目前,也已取得许多成就。劳动人民的社会组织——首先是那些具有最大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其中积极参加活动的会员现在已达两千六百万人——的权利已经扩大,它们所起的作用在不断增长。有两千多万人成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积极分子。有些劳动群众的代表机关的活动,例如大约有五百万职工参加的、经常发挥作用的生产会议,已经成为生产管理中必要的成分。有四百多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构成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各级成员。一百多万人在经济分析和制定规范的公共机关中工作,或是在其他一些类似的自愿组织的社会团体中工作,这些团体在生产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在克拉斯诺图兰斯克城进行的一次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职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国家的管理。

同时,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这时候还仅只采取了一些最初的步骤来吸收广大群众参与执行管理职能。大概还只是创立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组织结构。要使这一结构经常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目前,广大群众一般都还是穿插式地参加执行管理职能,他们在管理活动的全部内容中还都只占一个很平常的位置。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为更加顺利地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说,也就是解决普遍吸引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问题,不仅必须改进群众政治工作,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组织和经济措施。特别是直到最近,还有一种情况存在,它严重阻碍着吸引工人群众参加管理活动这一进程的开展,以及他们的活动范围。这就是,企业的活动是过分地从上面加以组织,工人在本企业生产经济活动的总收益中得不到必要的物质利益以刺激他们更加积极地为改进这种活动而斗争,也就是刺激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管理活动。在我们对各种企业的一千二百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访问时,大多数都提到这个问题。种种客观指标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比一般其他企业更能始终如一地实现成本会计原则和集体物质利益原则的生产集体中(塞维尔斯基冶金厂,各企业中的H·科萨列夫、B·波诺马廖夫、M·拉列京和其他成本会计组;上穆林斯基国营农场等等),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就显得无比地活跃。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美国出版的默里·雅诺维奇等编的《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变动》一书。本文原载一九六五年苏联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化》一书 秦仲立译)

## 所谓“茨洛宾工作法”

# “茨洛宾工作法”的厄运

上海市第七建筑公司青年工人 黎 丽

近几年，苏联的建筑行业出现了一个以推行所谓“全面的经济核算制”、“包工到队”为特点的“茨洛宾工作法”。它一出笼，就博得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青睐。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急忙忙把它抬举到同臭名昭著的“谢基诺”试验并列的地位，把它说成是一个“已取得成效的经验”。于是，苏修一些报刊杂志也沸沸扬扬，大肆捧场。据介绍，“茨洛宾工作法”已经越出了建筑业的范围，不仅在工业其他部门和农业中应用，而且还被推广到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东欧国家，还获得了发展兄弟国家“友谊和合作”的桂冠，甚至被说成是使“德苏友好协会”大大增加会员的“原因”。“茨洛宾工作法”的功能可谓大矣！

“茨洛宾工作法”既然有这么大的功能，又经过苏修御用学者的吹吹打打，竭力推荐，那末，它今天在苏联一定是广为应用、成绩卓著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一期摘译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茨洛宾工作法”不仅在其他生产部门遇到重重阻碍，即使在建筑行业也是步履维艰。例如，在土库曼，尽管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五百七十三三个建筑队中，只有二十七队采用了茨洛宾工作法”。而那些已经采用“茨洛宾工作法”的建筑队，景况也不美妙。最近，苏修二十五大还透露，在吉尔吉斯，一九七五年按“茨洛宾工作法”工作的八十四个建筑队，

只有八个队达到了计划指标。在好些地区，采用“茨洛宾工作法”的建筑队更是急剧减少。

为什么这个“能避免一切缺陷的万能药方”，现在却不灵了呢？于是，一批御用学者就象一群苍蝇叮住一块臭肉那样，围着这个“茨洛宾工作法”大作起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说什么阻碍推广“茨洛宾工作法”的主要原因是：基建摊子过大，“使人力物力分散了”，“材料供应不好和组织工作脱节”，“总包工组织和次包工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协作”，各级领导部门对“茨洛宾工作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等等。简而言之，苏修御用学者仍然把“茨洛宾工作法”说成是能够使苏修摆脱经济困境、“避免一切缺陷的万能药方”，至于为什么难以销售，乃是不能由这个“工作法”负其咎的。果真是这样吗？否！

众所周知，苏联的建筑业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搞得最糟的经济部门之一。多年来，基建计划年年落空，施工周期无止境地延长，未完工程占了基建投资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苏修建筑业的厄运，正是目前苏修国民经济江河日下、雕蔽不堪的缩影。为了弥补千疮百孔的苏修经济，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苏修统治集团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千方百计寻觅种种“救世良方”，以进一步加紧对国内人民的剥削，从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所谓“茨洛宾工作法”，便是在这种“经济改革”的土壤上长出的毒草。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人的创造”，而是苏修统治阶级一手炮制出来的黑经验。真是狗饥不择食，病笃乱投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苏修经济，怎么可能是贴几张“茨洛宾工作法”之类的狗皮膏药所能挽救的呢？

一九七一年，当“茨洛宾工作法”刚刚出笼的时候，也确实有点“三斧头”的劲道。建筑队书面签订合同，全面承担“物质上的责任”。这种“物质刺激”的金鞭子，也可能骗人于一时，把有些单

位的生产搞上去。但是，没有多久，特别是把它普遍推广以后，它的恶果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建筑材料老是供应不上，辅助部门总是拖拖拉拉，即使在建筑队内部，也是互相扯皮，吵闹不休，建筑业的情况越搞越糟。这一切都是追逐利润和奖金的必然结果。面对这种厄运，苏修学者也只得哀叹，这种包工制“不是能避免一切缺陷的万能药方”。其实，这也不过是轻描淡写。苏修的经济困境，决不是什么个别环节出了毛病，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复辟的必然结果。今天，苏修叛徒集团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只能是饮鸩止渴，自食其果。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之所以看中“茨洛宾工作法”，是因为这是一种剥削工人的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表面上给你一点甜头，到头来是使你吃足苦头。按照“茨洛宾工作法”规定，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落入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腰包，余下的部分被队长、“优秀者”和“良好者”坐地分赃，到广大工人手里只是一点残羹剩汁了。为了几个戈比，工人只好去卖命。这种“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是救不了苏修统治集团的，它已经而且越来越使苏联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最近，苏联广大建筑工人，就纷纷用罢工、怠工等形式，抵制“茨洛宾工作法”的推行。这是“茨洛宾工作法”遭到厄运的基本原因。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历来是摧毁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力量。目前，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还在那里鼓噪，但是如同苏修叛徒集团一样，“茨洛宾工作法”的命运也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糟的经济状况相反，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广阔建筑工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春意盎然，欣欣向荣，一派蓬勃兴旺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广大建筑工人头顶蓝天，脚踩荒原，建起一

片又·一片的新兴工业区，造出一幢又一幢的崭新厂房和住宅。在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广大建筑工人正以旺盛的斗志，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推行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扣、罚”等修正主义的黑货，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在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同时建设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 工作队是这样建设的

〔苏〕H·A·茨洛宾

自从我们同房建局签订了第一份建造房屋的合同以来，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那幢房子四周已种满了花草。人们舒舒服服地住着。照例早已不会去想它了。然而，现在每当我下班经过这幢房屋的时候，往事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想起同我们当时的主任杰缅季叶夫和洛克希恩的谈话。

我和组长瓦西利·米利亚叶夫、米哈伊尔·谢麦尼科夫、尼科莱·阿弗尼恩都没有立刻从专家的建议中找到新的启示。我们当时认为：“管理局应该有把握搞出计划……”工作队既要担负体力劳动，又要承担资金和材料耗费的责任，还要负责正确使用机械设备以及保证建筑速度和质量等，这岂不是开玩笑。

弗拉季米尔·格里戈里叶维奇说服了我。我必须把他的想法和意见给每个成员传达，使他们相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从而把它付诸于行动。经过很多争论，人们终于从工程师的建议中认识到并找出了那些很好的办法。我们同管理局签订了合同。合同里明确规定彼此应承担的义务。工作队规定了房屋建造的期限。期限的缩短对我们、对国家都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成本降低了，而利润提高了。这些利润的一定比例是发给建筑工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工资额直接取决于我们的组织性，取决于我们的工作质量。可以看出：在以经济核算制为基础的合同里，包含着促使人们关心高速、优质和节约的直接因素。当

然，为此还必须使各个环节都严格按计划办事。材料也应提前运到工地。

我们大家今天都称赞的第一幢房子，工作队比原计划提前八十天建成，我们化的经费不仅在预算之内，而且还比原计划节约了几千个卢布。当房子交给住户时，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建筑工人”这个称呼是多么崇高。

第一幢房子交出后，第二幢房子我们又提前一百五十三天竣工。紧接着又交出第三、第四幢。我们又造了幼儿园和学校。如果把我们造的建筑物汇集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区那么大。在建造这些工程时，我们共计缩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并节约了几万卢布。实践证明：队包工制——它是管理建筑部门的一种崭新形式。它的核心是经济核算制。

队包工制大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品行。今天，他们已不是工程的一般建筑人员，他们创造的新事不断涌现。这才真正发挥出人的才能，培养人们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和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

我们采用的那些技术革新，除个别外，都不是上面提出来的，而是工作队自己探索出来的。这些革新帮助我们节约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的时间。

记得，在维尔纽斯的大会上，当我介绍我队建造一幢房子提前一百五十三天完工的情况时，曾遭到与会者的嘲笑。这点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三年前我也不会相信。只有在今天我才知道，这些时间是如何节约的。

不久前，我们是用一台吊车卸材料和进行安装工作的。第一班时这台吊车用了四到六个小时，第二班也用了同样的时间。建造大楼一天用不上十来个小时。我们计算了一下，得出这样

的结论：要使用第二台 K-161 型吊车，增加的技术费用完全可用高速安装的赢利来弥补。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象劳动时随便去抽烟、随便闲逛等现象已完全杜绝了，这方面也用不着我多谈。因为这种劳动组织形式的本身能把这些现象化为乌有。包工队内部的友谊和互助加强了，队员对己、对人的要求都严格了。

我们和管理局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关系当然是挺好的。如果我们集体同外界隔了一道墙的话，那它未必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相反，我们乐于以工程技术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到处可以看到工程师在工程技术上全面地检验工作。杰缅季叶夫、洛克希恩、戈尔杰耶夫和巴克拉诺夫等专家经常和我们谈话，这使大家在劳动的组织和经济知识方面得益非浅。

现在有许多人到泽廖诺格勒来。他们对队包工制很感兴趣，还看了我们的现场操作。这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的担子也显得更重了。现在，不仅综合队，而且专业队，甚至还有整个工段都在推广经济核算制。因此，必须使队包工制日益完善。我们也常常举行队委会，研究这个问题。对会上所提到的那些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不能保持沉默。

队包工制可以说是群众的创议。确实，它在工人集体中是已经受了考验的。但实践证明：如不改进各个生产环节的工作，那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成效。例如，弗拉奇米尔·格罗莫夫的队同样是在泽廖诺格勒，但这个工作队的包工制不得力。第一次试验失败后，大家就不相信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搞形式主义。每个专家都懂得：如果工作队没有劳动的规划（哪怕是一年的规划也好），那么这种新的管理形式也只能是一段插曲而已。

如果我们要集体真正承担起自己劳动的责任，那它应看到

远景,并在今天就储备好使明天的工作更协调的力量。当然,我们搞了一个计划,但不要害怕说在目前它还是形式上的计划。工作队今天将结束房屋安装工作,工人们就可以陆续腾出来,他们又可派往新的工地。当这里的一部分安装工人还未完工时,那批腾出来的工人就可在新工地修筑材料和工具存放室及道路等。总之,应事先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这样,集体就可毫无耽误地立即着手新的安装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安排出象这种协调的连续工作方式。

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工地的供应工作问题,对此还有很多议论。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门虽然经常挨批评,但工作还是改进得很慢。这是因为一些专家对集体的成绩毫无责任感。他们上班时不动脑筋地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竟达到这样可笑的地步:常常把工作队在今天,甚至一个月以后也用不着的建筑材料运到了工地。运输时签发配套卡片,固然是件好事,但专家们对供应材料方面的责任难道就局限于签发配套卡吗?

对工地的供应工作做到精确和协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克服了上述缺点,成千的工作队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建筑速度。我相信,我不仅代表自己一个队,而且也是代表着成千的队在表示我们的忧虑。只在口头上空谈科学地组织劳动,而实际上却不为推行经济核算制积极地创造这一重要的条件,这难道能容许吗?每个专家和科学工作者,都应考虑怎样切实地帮助各工种的建筑工人从劳动中得到愉快,帮助他们提高建筑项目的效率。

还有一个问题:只有全面地、不打折扣地运用经济核算制,它才能产生真正的效力。而某些经济学家爱用一些复杂的、不易理解的工作细则,这使队经济核算制的作用削弱了。要记住,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到经济核算是怎么回事,了解到劳动报

酬的分配条件时,他们的工作才会有创造性,他们才会忘我地工作。

工作队长在签订合同以后的责任是重大的。他既要对计划负责,又要能合理地采取各项决定。工程的成就取决于工作队长对集体中每个人员心理状况掌握的程度以及同工人、工程师、供应人员和经济学家的关系建立得如何。我是依靠了党小组和队委会来解决这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建筑管理的形式和方法,使房屋建造的速度让尽量多的苏维埃人享受到乔迁之喜。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陆福英译)

## 我们按茨洛宾工作法工作

〔苏〕B·谢瓦斯季诺夫

在一九七三年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同志指出，在争取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中，应该更大胆、更迅速地采用先进集体已取得成效的经验，即谢基诺试验、茨洛宾同志建筑队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经验。

茨洛宾试验队包工制已有三年了。莫斯科人及以后学习他们的一些人所获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在苏共中央的支持下，这一经验已成为提高生产经济效率和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参加生产管理的强有力手段。

今天，《真理报》再一次介绍积累的经验，而且也谈谈在运用茨洛宾工作法中所碰到的问题。

万事开头难，但却为后来人指出了方向。因此，尼古拉·茨洛宾工作队的每一个胜利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今年的十一月，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合同义务。他们建造的总面积为一万五千八百一十平方米的三幢十二层楼房完全竣工。建筑时间缩短三百三十二天。核算结果表明，超计划利润是三万多卢布。工作队原订的义务是：建造一万零五百平方米的住房，每幢房子建筑时间缩短五十天。

从表面上看，茨洛宾工作队一年来并无多大变化。队的成员仍是那样的和睦团结，队长仍是那样精力充沛。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包工合同的实质，就看到了变化。无论是工作队，还是泽

廖诺格勒建筑局,双方的要求都更为严格了。因此,他们签订的合同就获得更充分的根据,对工程方面考虑得非常周到。当然,在实际完成这些义务时还要对许多既定的措施进行修正。现在,茨洛宾工作队中的每个成员都已掌握了三、四门专业,这样就能使劳动时间更紧凑地利用起来。同辅助单位的业务联系制度也更巩固了。

泽廖诺格勒人的经验越来越广泛地在各个建筑单位采用。实行包工制的工作队数目从一九七一年的一千五百个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六千个。劳动组织和工资的新形式,经多次试验,已取得显著的成果。根据去年的统计,二千个实行茨洛宾工作法的工作队的生产率比其余的队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建筑的日期缩短了百分之十三到六十。

广泛探讨和创造性学习先进经验是今年的特点。住房建筑联合企业和工业建筑中的一些工作队,领会到以严格的经济核算制为基础的包工制的实质后,对自己所行的包工制作了一些纠正。有些专业工作队曾各管各地实行劳动组织和工资的新形式,他们的失败教训使许多人记忆犹新。安装工按照泽廖诺格勒人的工作法,以空前的速度装配好房屋。然而装修工、木工、房盖工却好几个月慢腾腾地呆在那里。这就失去了包工制的主要意义——建筑工地处于“无主”状态,对建造的房子缺少全面负责的组织。于是,卡卢加房屋建筑工人首先建立了由若干专业队组成的包工流水工作制度。

这一经验在其他队推广了。今天,这种流水作业法已成功地在许多城市中应用。例如,在沃龙涅什市采用包工流水工作法造一幢房子,三十六天就竣工,而原来规定是七个半月时间。他们获得了一笔很大的超计划利润,其中一部分作为建筑工人的奖金。包工流水作业法和茨洛宾工作法有何不同呢?不同在于,

不只是一个工程队，而是好几个队同联合企业的行政签订合同。通常推举队长、专家、工地主任等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负责全部工程的竣工。

摩尔曼斯克市 B·谢里科夫工作队的经验值得注意。这种经验否定了这样的论断：劳动组织和工资新形式似乎在工业建筑中行不通。谢里科夫所领导的集体，同行政机构签订了合同，建造一项预算价值为三万卢布的南部热电厂的综合工程。以前这样的工程需要三百人的若干总包工组织才能完成。现在尽管谢里科夫工作队只有五十人，综合工程完成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了百分之三十三左右，质量良好。

建筑工程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不超过一年。机械建筑托拉斯制订了统一的工程进度表，当地定额研究所制定了劳动消耗和工资的估计表。工作队严格地遵守专家们的核算。

因此，队包工制已从实验阶段发展成为改进建筑事业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方法在许多建筑工地应用后日益完善。应用茨洛宾工作法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二倍。劳动组织和劳动工资的新形式促进工程期限的缩短，促进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的节约，促进培养工人对劳动的责任感和树立起崇高的主人翁思想。

这一切已为大量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在建筑业中共有二十五万个工作队，但应用茨洛宾方法的只有百分之二点四。实在太少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队包工制的推广呢？是工作队不愿意采用队包工制吗？绝不是。建筑部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工作队在今天就想签订合同了。人们自己跑到工会委员会，到行政机构去要求。但是经常遭到拒绝。问题何在？

很明显，建筑的成绩不光是依靠直接的执行者。这成绩是由生产的各个环节配合来决定的——从供应建筑材料的企业到

工地上的工作。采用茨洛宾方法所需要的这种协调，托拉斯和管理部门的物资供应者和物资运送者往往显得不得力。于是，在苏联工业建筑部系统中，年初曾有十八个队实行包工流水作业法，而今天只有十三个了。在巴什基尔建筑总局采用茨洛宾方法的队曾有四十三个，而现在只剩二十七了……

茨洛宾工作法不是热情的突然发作，也不是打破几个罕见记录的方法，它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这种形式要求改进整个建筑纽带上的一切环节。它也明确地指出了计划工作中的缺点。例如，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没有基础同时进行建筑上百个工程的，然而却在开始那么多的建筑工程。这样就使人力、物力分散了。

今年的实践证明，许多组织问题有待于解决。如何吸引次包工集体采用茨洛宾工作法？还是和先前一样悬而未决。先行的建筑队能否遵守合同，按期交出房屋，在许多方面都得依赖次包工者。泽廖诺格勒人的一些追随者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他们把超计划利润的一部分给他们的辅助单位，从物质利益上吸引他们关心加快工程的进展。然而这最多也只能是同志情谊的表现罢了。我们必须找到大家可行的方法，以便使次包工队也纳入队核算制的轨道。国家建筑委员会、苏联财政部、国家劳动工资委员会和苏联建筑银行无论如何不能推托自己的责任。

今天在许多组织中，不是一个队而是好些队按新工作方法进行工作，因此，建筑组织的劳动和工资部门的工程师就增加了许多事情。这些集体的经济核算工作量是很大的，要花三十到三十五天，今后将更复杂。为什么国家建筑委员会没有委托某个研究所简化这些核算方法呢？

（摘自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戈培莉译）

## 队核算制的新形式和工资的组成

〔苏〕B·阿兹别里 B·阿福宁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改进的速度、国民经济机构和生产劳动组织方法的完善,而且还取决于各个企业、建筑单位挖掘潜力的程度。

在莫斯科建筑总局泽廖诺格勒建筑管理局,由H·A·茨洛宾领导的综合工作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去年,该队工人在讨论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发的题为《关于改进生产潜力的运用和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节约制度》的一封信以后,仔细地分析了不合格产品和材料浪费的原因,认识到在多数场合,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工作队在使用材料方面缺乏责任心,所采用的刺激因素不够有力,等等。由此,工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修改建筑业中已采用的队核算制的形式。

众所周知,建筑业的队核算制是以奖励节约材料和保护建筑部件完好无损的建筑工作人员的条例为基础的。奖金的数额,不超过所节约材料价值的百分之四十以及被妥善保护的建筑部件和配件价值的百分之零点二。奖金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奖励工人,百分之十用于奖励工程技术人员。

但是实际上,一个有四十到五十人组成的工作队,在节约材料和妥善保护机械的情况下,用五到六个月时间完成一幢九层楼的建筑物后,只能获得二百到二百五十卢布的奖金,或者是每

一个工人平均每月得一个卢布，工程技术人员的奖金每月也不超过一个卢布五十戈比。因此，在这样的经济核算制的形式下，节约材料和妥善保护建筑部件的工作人员所得到奖金很少。还有，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队的工作成果，与降低整个工程的建筑安装成本的指标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往往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节约了材料，保护了机械，工作队也获得了奖金，但是整个工程成本却提高甚至亏本了。这是因为在评价经济核算队的工作时，没有考虑到如何保障降低机械的开支，降低附加开支和其他财政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开支取决于工作队的劳动生产率、工作进度和质量。所有这些实际上削弱了建筑单位为巩固队经济核算制所作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工人们才建议工作队采用全面的经济核算制。根据他们的见解，这种核算制应是建筑安装单位经济核算制的继续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九七〇年四月，茨洛宾队在泽廖诺格勒建造 915 和 918 号十四层楼住宅时，第一次试用了这种经济核算制。

茨洛宾队有四十七名各种专业工人：十八名泥水匠，六名安装工，一名电工，二名抹灰工，七名木工，五名混凝土工，二名绝缘工，一名屋面工，五名运输工。他们分两班完成砖楼地面部分的一般建筑工作，同时做好最后加工的准备工作的。

确定采用新的经济核算制的基本文件是建筑局和工作队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合同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工程的计划造价，工作队在工程中的职责范围，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施工期、降低成本和提高工程质量的物质奖励。合同中每幢楼的计划造价是四十一万二千卢布，其中队承担的工程价值为二十六万卢布。

#### 经济核算队承担的责任：

用本队的力量完成所有建筑准备工作和一般性建筑工作，专业性工作则由次包工单位按照方案、建筑标准及规章来完成；

按期为次包工单位准备好施工段；  
保证全部工程达到高质量，填交工程质量保单；  
接收并妥善保管建筑材料和配件；  
充分使用机械设备；  
按期装卸汽车载运的物资；  
遵守安全生产制度；  
消除各种不符合技术要求的现象以及工作中的缺点；  
比标准工期提前四十天完工；  
监督建筑费用的报销；  
赔偿由于工作队的错误所造成的超额开支和材料损失。  
建筑局承担的责任：

将生产方案中规定的机器设备、运输工具拨给经济核算队；  
按照工程进度，将建筑材料和配件运到工地；  
根据队完成包工合同的情况，保证按月支付工作队的工资；  
按期完成公共设备、运输线和通道修建等各项工作；  
办理好隐蔽工程单；  
如果不按期、按质量地供应配件、材料，要付罚款给工作队；  
按照工作队支出项目进行成本核算；  
授权工作队按月检查建筑费用的报销；  
根据计件奖励制度的现行条例，把奖金发给工作队；  
在工程完工、房屋提交使用以后，按照支出项目确定成本并  
按条例规定的数额把奖金发给工作队；  
根据所定级别和劳动时间，把奖金分配给工作队成员。

茨洛宾队在准备采用全面核算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人过分谨慎地认为，必须限制队核算制的范围，即限制在降低机械化的开支和节约材料指标的范围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无需规定工程的核算价值，工作队的成果

可通过同整个预算价值相比较来确定。

有人建议,采用奖励降低建筑安装成本的单一制度(奖金在节约金一半的范围内)来代替根据承包合同奖励完成任务和节约材料的三个现行条例。但是,详细的分析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给予队的奖金数额,将少于按三个现行条例规定的奖金数额。

经过讨论作出了决定: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应根据当地条件规定工程的核算价值,核算价值中包括了与包工队有关的各项开支。

例如,建造 915 号楼的预算价值是四十九万七千卢布,合同的核算价值为四十一万二千卢布,其中包工队承担工程的价值二十六万卢布,内有一万三千五百卢布用于工作队的附加开支。

采用新的经济核算形式时,建筑局必须让全体工程技术人员担负技术领导,要他们遵守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规则以及对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局必须按照工程进度供应材料、建筑部件和配件。运到工地上露天存放的材料、部件和配件,须由队长或受他委托的工人协同工长接收。从仓库中提出的材料由队长或他指定的专人接收,并在限额-定量卡上签字。

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完成,建筑局会同工作队成立了专门组织来研究次包工队的权利。

包工奖励任务单应预先交给工作队。任务单内规定了定额时间、队完成所承担工程的工资总额以及奖金额(它根据工程质量和缩短定额时间的百分比发给)。

在包工单中规定了劳动消耗和完成基本工作、附带工作和辅助工作的工资。这些工作中包括建造不列入预算的临时建筑物、修筑工地的通道、添设安全生产的补充措施以及竣工时的后勤工作,为次包工队的服务工作和值勤工作等等。发了这种包工单就排除了按附加任务单支付工资的可能性。

工长和工作队长根据大楼工程完成的程度，按照阶段核算来确定每月的工资额。按照包工奖励任务单进行的最终核算，则在队完成所承担的全部工作、建筑工程上交验收后进行。

以前，工作队的奖金是照计件奖励制的办法按每月的工作成绩发给的，通常不考虑工程完成的期限及质量。

茨洛宾队的奖金是一次发给的，也就是在工程提前完成并由国家委员会验收后才发给。

为了便于对经济核算制的工作队进行业务监督，由建筑局会计处及生产技术处按月确定建筑安装工作的成本和工作队达到的节约金额，在工程结束时要计算出建筑安装工作的实际成本和同工程核算价值相比较的节约金额。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完成的期限和质量，确定核算队工人的奖金额。它的数额不超过超计划利润的百分之四十。

新的经济核算形式使精确计算和减少材料消耗成为每个队员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在建造房屋时，砖头、窗板、灰泥、钢筋混凝土部件、木料以及其他材料都得到妥善保管。

骤然看来，茨洛宾队的创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队经济核算制的结构。然而，实践、详细的分析和对这个集体的直接观察都表明，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现在，工作队不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程的一定阶段，而且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最终成果和降低全工程的成本。

在新的条件下，每个队员对自己工作的责任心大大提高了。工人们都明白，质量不好只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附加开支来弥补，而这意味着减少奖金。卸货工在接收材料时，总是仔细地检查数量和质量。在建造大楼的整段时间内，工人们没有打破过一块玻璃。砖块、碎石都堆放在一定的地方。工地上整齐而且清洁。劳动纪律显著好转。队里没有发生过任何违反纪律的

事件。浪费工时的现象杜绝了。

在新的条件下，队的经济独立性扩大了，工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关心也大大加强。社会利益和工作队的集体利益也更加合理地结合起来。

工作队平均在四到五天内就可建成一层楼。这比莫斯科建筑总局其他综合建筑队的工作速度快一倍多。现在建造 915 号和 908 号楼比过去建造同类建筑物所花时间约分别缩短十分之三和十分之六。根据莫斯科建筑总局的流水作业施工进度表，建造这样的房屋须用二百三十五个工作日。可见，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和百分之七十九。从这两幢楼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为二万四千八百卢布。

除一万三千一百卢布是计件奖励制度的奖金外，工作队由于全面降低了安装建筑工作的成本而多得了四千二百和四千卢布奖金。工作队的奖金总数在 915 号楼为计件工资数额的百分之五十左右，908 号楼为百分之五十五左右。每日平均工资加上奖金有十卢布。

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财政部和建设银行研究了茨洛宾队的经验，批准了综合工作队试行新的经济核算制临时条例。

以茨洛宾工作队的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的新形式将有力地促进建筑工人去完成苏共二十四大决议中提出的任务。

(摘译自一九七一年第九期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于桂林译)

## 坚固的砌体

〔苏〕IO·别德齐克

“乌克兰”文化宫的大礼堂里聚集着来自全共和国的工业和建筑工程的先进分子。布什马走上讲台时，显然很激动，他似乎连全场的鼓掌声也没听到。

老朋友们，基辅的房屋建筑工人们也许希望听听布什马他们是如何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听听他们有哪些新的打算。伊万·伊万诺维奇·布什马是个好心肠的人，性情温和，他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他领导的安装队，名闻全共和国。去年，布什马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很多地方，远至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有建筑工人前来向他学艺。

然而，布什马讲话时却并不十分高兴。成绩吗？是有的，但是本来可以取得更大一些。住房是不是都提前安装好了？要知道这些房子在竣工上交以前，有时却要长期地停工。质量呢？是的，正在不断改进，可是有的工作没有做完，有的工作很粗糙，往往使新住户感到不快。

“总而言之，我们这里还是大有潜力可挖，”他提高了嗓音说，“第一，完全可以加快房屋安装和其他工作的速度。我们采用队包工制的茨洛宾工作法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行动迟缓，小心谨慎。要知道，实行这种方法有很大好处。”

如果乘小汽艇沿着第聂伯河航行，驶过基辅，在左岸上岸，那么在我们的面前就展现出奥鲍洛尼地区一大片正在建筑的房

屋。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建筑队就在那里工作。

我早就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他。他们说，布什马虽然比较年青，但已经胜过当地很多有经验的建筑工人。他精力充沛，善于接近人。继维克托尔·阿尔捷缅科（他也是第一住房建筑联合企业的队长）之后，伊万·伊万诺维奇也开始坚决推广尼古拉·茨洛宾的创举——队包工制。当然，现在茨洛宾方法对于基辅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陌生了。在联合企业中有很多队，如维克托尔·阿尔捷缅科队、格里戈里·顿茨队、特米塔里·贾杰维奇队等等，因为掌握了这个方法，已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要真正掌握这一先进方法并精通它，就必须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和坚定的目的性。

布什马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是在生活中逐渐地培养起来的。他生长在集体农庄庄员家庭里。战后，他参加了学习，后来帮助家乡搞恢复建设工作，最后来到基辅的建筑工地。从一九六〇年起，他开始领导综合安装队。

布什马对工作的主人翁感和对党的崇高的责任感不断地激励他去挖掘新的潜力。就以那个茨洛宾方法为例，他不是机械地把它搬来，而是注意到高速流水作业建筑的特点，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比如他决定在队里开展组与组之间的竞赛，每天进行一次总结。

“我们全队在考虑，”布什马回忆说，“怎样才能使竞赛给工作增添更大的热情呢？怎样才能使小组的竞争活跃起来呢？……下班后，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一组接一组地进行汇报：做了些什么？生产价格多少？自然也考虑到质量。由集体决定，谁该得第一名。优胜者当场得到大家的祝贺，最后一名只能感到羞愧。这样，每个人对自己看得很清楚，对自己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人们已经习惯于新的方法。新方法激励着我们。现在大家

都知道自己在一天内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谁工作好,谁工作差。”

“队里开展小组竞赛以后,有没有人感到不满意呢?”

布什马微微一笑。当然,那些习惯于躲藏在别人背后生活的人,这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但是他们也赶上来了:要知道,每个人都处在集体监督之下。现在甚至很难说,究竟哪个组最好,因为今天某个组走在前,而明天另一个组赶过了它。布什马确信,党小组长尼古拉·波得鲁加的组是永远不会叫队为难的。年青的共产党员阿列克萨尔·戈托尼克的组里大部分小伙子在昨天还是中小學生,今天他们的水平与师傅们一般高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一想起康杰叶夫组里发生的“麻烦事”,直到现在还感到很难过。组里那些小伙子劳动很不错,但是不久就骄傲起来了,听不进集体的意见。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他们说,我们顶好,可以任意妄为。于是我们把建筑队召集起来,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不讲私人情面的谈话。康杰叶夫的组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怎么办呢?安装队同志们的意见是,我们集体不需要那样的人。就这样,康杰叶夫小组离开了这个队到别的建筑部门去了,可是队长心里很沉重……

布什马是茨洛宾方法的坚定的拥护者。他敢于反对阻碍工作的一切。

布什马说,“如果不及时提供我们需要的材料,也没有技术上的保证,那么队包工制就不会自动产生效果。有时简直非常痛心,因为辅助企业拖后腿,安装好的房子停工往往一停就几个月。请计算一下吧,这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我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全体辅助人员也都应该参加队包工制。”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张惠珠译)

## 谁破坏了合同？

〔苏〕A·库切列思科

茨洛宾经验没有在土库曼建筑工地得到切实推广。

费多尔·伊瓦诺维奇·奥维奇基恩是土库曼中央建筑管理局的一个队长，三十年来一直在阿什哈巴德建造房屋。他非常精通建筑业，掌握了全部建筑技术。他领导的集体是和睦团结的。他早就打算应用尼古拉·茨洛宾的经验，但直到去年才遇到合适的工程——大型墙板制造厂行政和日常生活综合工程，这项综合工程规模巨大，又很复杂，但这并没有使奥维奇基恩感到为难。

他们签订了承包合同。在合同中对机械化程度、材料供应期限及采取科学组织劳动等方面都作了规定。他们制订了方格调度表。工程预计可在一九七四年年末竣工。工作队集体讨论合同后，奥维奇基恩在上面签了字。

过了一年，在六月的烈日下，人们经过城东时，可以看见一幢空洞洞的四层楼房，那里的装修工作即将结束。

奥维奇基恩说：“工程没有履行合同，进度大大延期了。”

工作队开始工作得不错，超过进度表。后来墙却不见砌高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钢筋混凝土制品厂不给他们货，一拖再拖，最后干脆不生产。大家只能用手工砌墙。

在这种情况下，岂能按照计划工作呢？而且，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费用的超支也因此“吃掉了”全部节约金。

后来越来越麻烦。三楼和四楼的楼梯和顶盖运送工作又一次延迟。供应失调已习以为常。

现在,当综合工程准备移交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不遵守建筑工程的期限,这根本谈不上什么节约;甚至只得听任材料费用的超支,让它破坏全部经济核算制的原则。

错误一开始就形成了。建筑工地没有做好工程的准备工作。地下水位很高,要求补充劳动和时间的消耗,以铺设排水管排水,但由于没有考虑到供应的措施,因此,产生了材料供应的不协调,经常打乱了工作队的主要工作……

这个例子足够典型了。

采用承包制的综合工作队领导C·格列奇什尼科夫埋怨说:“我们经常遇到材料供应上的困难,供应时松时紧,经常停工,要完成计划只得搞‘突击’”。

目前,在土库曼中央建筑管理局有九个工作队采用茨洛宾的工作法,这九个队中没有一个队采用完全经济核算制,没有一个队履行合同的全部条件。根本的原因是建筑材料供应不好和组织工作脱节。由此可见,破坏合同的不是工作队,而是签订合同的领导。

加盟共和国建筑部仅仅在口头上支持工作队的经济核算制,举办各种讲习班,召开会议,竭力宣传新工作法。但是事实上,目前在土库曼的五百七十三三个建筑队中,只有二十七个工作队实行经济核算制(按照计划应该有八十二个工作队,托拉斯中有十分之三的工作队是按照茨洛宾方法工作)。

加盟共和国建筑部副部长B·库什佩利说:“是的,队经济核算制在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得到推广,虽然追随茨洛宾的工作队数目大有发展的可能。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

话倒说得颇有自我批评味道。但是部里任何人也没有认真

地推广这种有效的工作法。部的领导埋怨说：“中级专家对茨洛宾工作法学习得不好。”那么，谁应该教育他们？谁应该使他们支持新生事物呢？

不久前，加盟共和国对推行队经济核算制的过程作了一次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搞清送到部里的汇报材料的正确程度，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关于应用包工制成果的全面材料，委托托拉斯详细研究那些采用茨洛宾方法的工作队的经验，此后部领导将采取措施克服存在的缺点。”

公文周转代替了当前工作。这种典型的事实说明：加盟共和国部里的一些机关对这样的大事只是袖手旁观。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余菊芬译

## 茨洛宾工作法用于工业建筑

〔苏〕И·索洛马季恩<sup>①</sup>

在完成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里，我们部面临着完成比一九七四年多百分之十一的建筑安装任务，要使数百个国民经济极其重要的工程动工，建成千百万平方米面积的房屋。为了解决上述任务，许多建筑组织正把科学技术的成就、生产劳动组织的先进形式和进一步广泛运用尼古拉·茨洛宾经济核算队的方法结合起来。

考虑到工业建筑工程的特殊性，茨洛宾工作法先在部里的一些工作队中进行试点。一九七三年工业建筑工程有一百七十个工作队采用茨洛宾工作法，到了一九七四年，增加为五百十一个工作队。据他们的经验，平均缩短建筑时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降低建筑安装预算价值百分之二到三，并且工程质量良好。

但是，积累的经验证明：队包工制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建筑工业中能避免一切缺陷的万能药方。只有使每个基层建筑部门在组织生产、劳动和管理方面达到高水平的条件下，茨洛宾工作法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这方法促使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工作时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能力。

同时，还有不少因素阻碍着队包工制(包括在工业建筑中)的推广。定货者经常不按期交出设计预算文件便是因素之一。往往不能做到在建筑动工前一年的九月份前把设计预算文件交

<sup>①</sup> 作者是苏联工业建筑部劳动工资局局长。

给总承包单位,而在整个建筑年度里,这些文件既不成套又不按施工阶段零零落落地送到工地。

对现在的设计预算文件的质量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文件往往没有同次包工组织协商,有很多地方提高了建筑预算造价。队经济核算制由于规划建筑生产中的下列一些严重缺陷而产生困难:一年中建筑工程动工时间不平衡(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工业工程安排在下半年开工),工程的基本投资分散到许多同时进行建设的项目上,各单位不能按期制出预算表等。

在工业建筑工程中推广茨洛宾工作法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 是总包工组织和次包工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协作关系。这两组织在全工程中采取措施以保证各经济核算队如期完成所承担的工程,目前只在一小部分工业建筑工程中做到。然而,这方面的经验在部的系统里是积累了一些。白俄罗斯共和国工业建筑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安装专业工程部一道制订和批准了工作队实行经济核算的共同措施。总包工队既和自己的安装管理局、同时又和所有的次包工队(装修工人、安装工人等)共同订立一个合同,各个次包工队同样也要和自己的安装管理局订立合同。这样的制度可以克服建筑工程中工作上的不协调现象。

大规模地推广包工制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建筑物资供应不足而造成。许多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各环节(从建筑材料到工地)缺乏有组织的协作关系,这就导致建筑材料供应上的不及时、不合规格,以及包工组织和次包工组织在工作上的不协调。建筑物资在供给、管理和计划方面的改进工作目前进行缓慢,队工作量年度计划制订方面的改进工作现在进行得也很慢。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第五期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郑修虹译)

## 农村采用队包工制

〔苏〕H·安东诺夫

两年前，梁赞州的农村建筑工人已开始采用茨洛宾工作队的经验。由С·С·尤季内领导的梁赞州七一七流动机械工作队首先采用，十二套住房的建造期缩短到一百六十九个工作日，同时成功地节约了好几千卢布，工作质量也是好的。

去年，这样的试验已推广到农村生产建筑的项目中。А·М·杰耶夫领导的米哈依洛夫区的 ПМК 二一一工作队也开始采用。这个工作队同二十二大国营农场签订了建造养牛场的合同。结果是：移交的时间比计划大大地提前，节约了一万七千卢布。每个工人平均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八点八的定额，每个队员每月的工资超过了三百卢布。此外，由于提前移交养牛场和节约材料，每个队员另得一百五十七个卢布的奖金。

在梁赞州农村建筑局的党委和建设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分析了在农村采用茨洛宾工作法的经验。为了促进队包工制的推广，在局里建立了由茹林总工程师领导的专门委员会。

梁赞州农村建筑局主任杰赫特列夫说：“现在，我们已有八个综合工作队采用茨洛宾工作法，最近两、三个月又有八个队将采用经济核算制。苏共梁赞州执行委员会肯定了我们的好经验。这样，开辟了农村建筑中采用茨洛宾工作法的道路。”

（摘自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  
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郑灿平译）

## 茨洛宾工作法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M·波德克柳奇尼科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一段时期,波茨坦住房建筑联合企业获得很大的声望。约阿希姆·伊德列尔工程师是波茨坦住房建筑联合企业的经济副经理,他专门负责茨洛宾工作法的推广工作。他说:“早在两年前,茨洛宾工作法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在联合企业中开展了竞赛。就在这时,正好刊登了苏联建筑单位经济核算的文章,这样,要去掌握苏联新工作法的思想很快就在联合企业中得到了反映。”

经过全面的讨论,建立了以联合企业总经理丘恩捷尔·基阿伊恩为首的贯彻茨洛宾工作法委员会。设计员、技术员、定额计算员、经济学家、生产者都吸收到该委员会中搞合作。共产党员在茨洛宾工作法的宣传中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生产集体里和工人们谈话时,给人们解释什么叫做工作队的经济核算制。在出版的以茨洛宾工作法为题材的宣传材料上是这样结尾的:“向我们的苏联朋友学习,就是学习获得胜利!”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安排了巡回展览会,该展览会专门宣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展览会的材料很多是叙述茨洛宾的工作法。

为了开始推广新的工作法,决定在一条流水作业线上进行

试验。试验在劳动英雄列奥·卡帕利希恩斯基领导的第五条流水作业线上进行。该条流水作业线在作好充分的准备后即按照苏联的最新工作法开始了工作。在波茨坦西区的第十五号街道开始动工了。很快就显示出了集体操作比以往更加协调的气氛。当工程完工后，在移交时，经济学家们马上就搞出了总结。总结不用解释也很明显：按照过去的常规，建造这样的房屋需要一百零二天；实施新工作法，生产集体原来预计花费五十三天，而实际上把活作完才用了五十一天的时间。

采用了茨洛宾工作法的流水作业线的工程，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了成果。加恩斯·希弗巴乌埃尔强调指出：和苏联合作又一次清楚地显示出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强大力量。在流水作业线的生产集体中不仅劳动的积极性，而且政治的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这并不是偶然的。最近时期，在这里的德苏友好协会的会员也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在联合企业里不论和谁谈话，人们都热情地回忆起去年秋天尼古拉·茨洛宾在他们那里作客的情景，茨洛宾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德国朋友是怎样应用苏联方法并对这方法又加了些什么新的内容。波茨坦市的工人一下子就把著名的苏联客人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真正的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在工地上到处可以听到：“请向茨洛宾同志转告我们最衷心的问候！”

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广泛地运用茨洛宾工作法。目前有五十条流水作业线六千多人按照茨洛宾工作法在工作着。住宅建造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共和国的劳动者们胜利地在实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政治纲领。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刘列义译）

## 勃列日涅夫的嗜“沙”癖

梁 锋

多年来，“历史学”和“考古学”在苏联大出风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已越来越染上“历史癖”和“考古癖”了。大概是嗜“沙”成癖的缘故吧？他们的“历史学”、“考古学”，总是忘不了把老沙皇的亡灵捧出来祭奠一番。此中究竟，读完本期选译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俄中关系》和《古西伯利亚》这两篇东西，可知底里。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中关系》一文中，所谓的历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大谈老沙皇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大谈俄中两国的“睦邻”关系。在他的笔下，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伊格纳提耶夫这批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鹰犬，一个个成了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特别是那个负责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伊格纳提耶夫，更被捧成为奠定俄中“友谊”的“英雄”。伊格纳提耶夫是何许人？沙皇侵略军的少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窜到中国。这个家伙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如果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他还说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正是这么一个政治骗子，这个一手迫使当时中国政府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割让给沙皇俄国的刽子手，今天在苏修先生的笔下竟成了中国人民的“天然盟友”了。但是这样一来，反倒证出伊格纳提耶夫原来是李林甫一

类人物。毛主席说：“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今天的新沙皇请出伊格纳提耶夫这类李林甫式的亡灵，用意是明显的。他们今天不是以第三世界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吗？这叫做“口蜜”。但是，人们从欧洲上空密布的战云，从印度洋、地中海的滚滚浊浪，从安哥拉大地的隆隆炮声中，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沙皇的“腹剑”已经出鞘，已经沾满非洲人民的鲜血了吗？“口蜜腹剑”是老沙皇的传统，也是新沙皇的特征。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已经到手的死死抓住不放，没有到手的拼命伸出魔爪，这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但是，老沙皇在一切帝国主义者中，堪称首屈一指。不过老沙皇要是同新沙皇的胃口相比，恐怕也要自叹勿如的。《古西伯利亚》这篇“考古”文章，发表于“行销”世界各国的《苏联画报》，它居然“考”出我国的“满族不是中国人，满族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不依附中国的独立国家”。这是什么“考古”吗？不！这是“考今”。如果说，当年的老沙皇还不敢公然把我国东北地区全部吞掉，那末，今天的新沙皇已经在制造舆论，磨刀霍霍了。今天，新沙皇可以“考”出“满族不是中国人”；明天，他当能“考”出“斯拉夫人原来就是一个国家”；后天，它更能“考”出“世界四大洋五大洲都有过俄国探险者的足迹”了，因而结论是，全世界的陆地和海洋，都是罗曼诺夫王朝的遗产，都应该列入新沙皇的版图。试问，历史上谁人有过这样妄图囊括世界的野心？没有了。

现在清楚啦。勃列日涅夫嗜“沙”成癖，原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历史在前进，人民要革命，帝国主义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生于末世运偏消”，尽管苏修野心很大，但是力不从心，矛盾重重，人民革命的滚滚波涛终将席卷勃列日涅夫及其嗜“沙”癖以去！

## 十九世纪中期的俄中关系

〔苏〕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罗斯帝国的国界和中国的领土毗邻，决定了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历史悠久的经常而密切的联系。两国关系的发展符合友好睦邻的精神。十九世纪中期远东的国际局势在客观上促使俄国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因为两个国家都和这一时期在东亚采取最积极攻势的列强——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俄国和英、法、土耳其、撒丁的联盟之间的克里木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使俄国的东北边境——鄂霍次克海的沿岸地区和堪察加受到威胁；在英法舰队的攻击下，连接这些地区和俄国的欧洲港口间的海上交通处于危险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江河和陆路运输以维持东西伯利亚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联系，对于俄国政府来说，就显得极其必要了。在这以前，于一八五〇年乘运输船“贝加尔号”从海上进入阿穆尔河<sup>①</sup>河口的Г·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队，完全推翻了著名的旅行家拉彼鲁兹（一七八七年）、布罗乌顿（一七九七年）和克鲁逊什特恩（一八〇三年）等人认为阿穆尔河河口好象消失在沙滩里，不适宜入海船只通航，萨哈林岛<sup>②</sup>是半岛等错误的见解。Г·涅维尔斯科依的发现重新使俄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阿穆尔河上。在鄂霍次克海岸附近展开的俄国和英法联军的军

①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② 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译者

事行动，加速了对阿穆尔河的占领。一八五四年，俄国的船只必须隐蔽在阿穆尔河河口，以躲避英法联合舰队的追击。在这一年，这儿建成了俄国的第一个海港——尼古拉耶夫斯克<sup>①</sup>港。然而，人数不多的驻防军无法预料能否对英法联军进行长期抵抗，要求立刻从东西伯利亚增援。

一八五四年四月，东西伯利亚总督 H·H·穆拉维约夫经本国政府批准，将俄国军队拟沿阿穆尔河向太平洋沿岸航行的决定通知中国的外交机构(理藩院)。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同英法的战争已经爆发，俄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不容许英国船只进入阿穆尔河。不等中国方面作出正式回答，穆拉维约夫于一八五四年五月十四日派遣第一支部队乘“阿尔贡号”汽船顺流而下。以后又进行了几次类似的行动，每次都通知了阿穆尔河右岸的清朝政府。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报告，黑龙江城(瑗珲城)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进行任何阻挠，而且在俄国军队沿阿穆尔河前进的时候给予协助，向他们提供食品、马匹和向导，并且推说有命令不准与外国人在阿穆尔河上进行贸易而拒绝收取酬金。

穆拉维约夫在巩固远东领地的防务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使俄国的驻防军能够在沿岸地区击退优势的英法联合舰队的进攻，寸土未失地在远东结束战争。

在克里木战争后，俄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俄国在远东的地位，同时，政府从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出发来制定远东政策。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卡罗夫)与阿穆尔河右岸的清朝政权机关保持经常接触的东西伯利亚总督 H·H·穆拉维约夫证实，清朝政府对于俄国人为了防御英国和其他外国的进犯而占领阿穆尔河是采取

---

<sup>①</sup> 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译者

友好态度的。这就使俄国政府有理由在中断了两个世纪以后重新向阿穆尔河沿岸移民。

一八五五年的春天和夏天，在阿穆尔河的左岸建立的俄国人的村庄有伊尔库特村、博哥罗德村、米哈依洛夫村、新米哈依洛夫村和沃斯克列先斯克村。在马林斯克哨所对面的苏契岛上，一连哥萨克骑兵建立了苏契镇。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亚历山大二世赞同建立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到马林斯克哨所的阿穆尔防线的计划。

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在远东的战争，不仅暴露了俄国陆上运输线的弱点，还暴露了沿岸地区缺乏防卫能力。建立军事基地和深水不冻港成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生死攸关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国内危机。作为清朝帝国宫廷对外政策基础的孤立主义，导致中国脱离国际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落后于那些已经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国家。国家经济的落后和清朝制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造成了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奋起与摇摇欲坠的封建君主制度作斗争。一八五一年在中国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即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

西方列强并不立刻决定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方针。清朝政府不愿意同欧洲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不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大使馆，使英国和法国对清朝宫廷采取敌对立场。最大的欧洲强国去和太平天国进行接触了。为此目的，英国和法国派了自己的使节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现在的南京去。他们原来以为，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将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西方国家和取消对外国的商业资本渗入中国腹地的限制。

英国和清朝政府新的冲突(一八五六年)，引起了有法国参加的(一八五七年)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迫使清

政府投降同时确信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要求绝对禁止鸦片输入中国并要求确立“国际关系中的完全平等”后，英国和法国，后来还有美国，才最后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些国家站在清朝政府一边反对太平天国，并且终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方列强反华同盟的主要国家——英国，在准备向中国发动新的进攻时，竭力拉拢俄国加入反对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共同行动。然而，作为对这一建议的答复，俄国政府在一八五七年六月一日通过驻巴黎的大使基塞列夫声明，在对华关系中，俄国“不参与任何一种暴力行动”和“不诉诸威胁”。

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在中国遭到包括清朝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在太平天国开始衰弱后（一八五六年九月，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冲突），清朝执政者对西欧国家侵犯中国主权的新的图谋采取了较为坚决的立场。由于俄国没有加入中国的国内斗争，没有享受西方国家所获得的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特权（治外法权、租界等等），由于两个世纪以来的俄中边界贸易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舆论界对待俄国的态度是较为友好的。

在指出俄国对华关系上的特点时，卡尔·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写道：“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马克思指的是俄国传教士团——作者）的优先权。……既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他们从来就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纠纷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没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

然而,尽管俄中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但两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由各种误会所造成的未解决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在漫长的边疆地带的某些地段确定边界的问题,因为在签订涅尔琴斯克条约<sup>①</sup>(一六八九年)时,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北的大片领土没有确定边界,而恰克图条约(一七二七年)仅仅在后贝加尔—蒙古地段确定了边界。

在整个漫长的国界线上,将贸易正式限定在唯一的贸易地点——恰克图(祖鲁海图早在十八世纪前半期末就不发挥作用了)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情况。而且,在恰克图采取的以货易货的形式严重地阻碍了贸易关系的发展。那时候在世界上普遍使用现款、支票、期票等等。

在消除俄中贸易经济和边界关系中的障碍方面所采取的第一项重大措施,是一八五一年在伊宁缔结了贸易协定。

一八五〇年五月,清朝皇帝指派新疆的都督奕山与俄国的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E·II·科瓦列夫斯基进行谈判,以便确定在中国的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州(现在为新疆)和俄国的中亚细亚领地的边界上进行贸易的条件。道光皇帝采纳了奕山的建议,将贸易限制在两个地点:伊宁和塔城。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三日发出的圣旨里着重指出:“至于喀什噶尔,那就不必在那儿(与俄国)建立贸易关系了。”拒绝的理由是,“喀什噶尔远离中国本土,商人稀少,缺乏进行贸易的人员。”拒绝俄国人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的真正理由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对满族和汉族压迫者的仇恨,迫使清朝一方面防止与俄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限制俄国的影响,尤其是在新疆的西南地区,那

---

<sup>①</sup> 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译者

里的局势一直是不稳定的。

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伊宁“为了两国臣民在伊犁（伊宁）和塔尔巴哈台（塔城）开市贸易”，由 E·II·科瓦列夫斯基和新疆长官奕山、塔尔巴哈台军事长官布杨泰分别代表俄国和中国签署了贸易协定。

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重复了正在执行的俄中恰克图条约。和在恰克图一样，在伊宁和塔城的贸易也是现货交易，不允许商人以记账方法出售货物。现货交易的价格由两国商人自定。对进行贸易的俄国臣民的监督由俄国领事负责，而对中国臣民的监督由伊犁行政长官负责。根据条约的条款，俄国商人可以于每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在伊宁和塔城逗留。到伊宁和塔城去的驮运货物的商队，必须在中国警备队的护送下走规定的路线。

伊宁条约奠定了俄国和新疆边界上适应历史发展情况的俄中正式关系的法律基础，它无疑地在俄中两国睦邻关系的发展和正常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俄国和中国说来，更为急迫的问题是：在“未划分边界的地区”确定边界，确定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船只航行规则以及在这些地区的俄中贸易制度等。

俄中两国的共同利益造成了进一步密切俄中关系的有利局面。俄国政府指派穆拉维约夫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一八五五年，在穆拉维约夫和清朝的边境政府之间进行了第一轮谈判，然而没有签署任何正式的协议。一八五七年初，以海军上将 E·B·普提雅廷为团长的使团被派往中国。普提雅廷的任务是，将西欧国家所获得的在“开放”港口进行海上贸易的特权扩大到俄国，并就与中国毗邻的远东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经恰克图前往北京的普提雅廷得到严格的指令，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和只能通

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Е·И·科瓦列夫斯基对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立场表达得很清楚。这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写道：“俄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欧洲人攻占北京，如同英国人攻克赫拉特<sup>①</sup>，同样会使我们感到难受，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心平气和的旁观者；因为前者会使我们在太平洋和阿穆尔河沿岸所创建的一切不能继续发挥作用，而后者呢，使整个中亚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然而，清朝当局拒绝普提雅廷进入北京。他沿着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了天津。然而他在这里很久不能与清朝政府举行谈判。清朝政府以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立场辩解，理由之一是，天津“实非两国使臣谈判之地”。在理藩院的一次答复里指出，边界问题应该在当地解决，建议普提雅廷回到边界。

俄国政府考虑到局势已经变得复杂化（而且普提雅廷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始终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他有几次向清朝代表提出的建议不符合俄国的政策），便决定同意清朝执政者的建议，让确定两国边界的谈判在当地，即在边境地区举行，清朝官员也准备到那儿去。

一八五七年末，俄国政府给理藩院发了咨文，文中提醒清朝当局，说他们没有答复俄国关于共同保卫阿穆尔河的建议，并且确定由 И·И·穆拉维约夫负责就更明确地划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的边界和这两条河上的航行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俄历十日），穆拉维约夫在瑗珲会见清朝皇帝的全权代表——黑龙江将军奕山。经过六天的谈判，于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俄历十六日）签订了俄中瑗珲条约。根

---

① 赫拉特是阿富汗西北部的重要城市。——译者

据中国方面的建议，在条约的序言里指出，这项条约是“欲期两国永远友好、两国臣民有益”而“共同议定”的。在璦琿条约的第一条中载明：“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到阿穆尔河海口，为俄国所属；右岸顺河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属。”至于“自乌苏里江直至海”的土地，则“在两国划定边界之前，为大清与俄国共管之地”。在这一条款里还规定：“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只准大清、俄国船只往来，别国船只不准行走。”

璦琿条约消除了由恰克图条约规定的俄中贸易方面的区域限制：“为两国臣民永相和好，居住在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沿岸的两国臣民，准其进行贸易，官员等应在两岸保护两国贸易之人。”

清朝皇帝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俄历二日）的圣旨里宣布批准“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条款，呼吁俄国政府“力促英国人和法国人反省，并制止他们提出苛刻的要求”。清政府由于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响，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待普提雅廷使团的态度。

在与英法两国谈判签订新条约时，清朝政府竭力想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普提雅廷报告本国政府，清朝官员向他建议，由俄国充当中国与西欧列强进行和谈的调停人。由于俄国没有支持西方国家提出的包括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的一系列要求，所以清朝政府希望用签订俄中条约的方法来限制英国的敲诈勒索。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俄历一日）在天津签订的俄中条约是以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早就签订的条约中的条款为基础的。按照政府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的指令，俄国也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俄国获得了在对外开放的通商港口进行海上贸易和在这些港口享受外国已享受到的一切优惠的权利。

天津条约规定，在北京和恰克图之间建立每月来往的邮政联系，运送货物的大宗邮件则每三个月办理一次。在条约里反映了两国想最终确定两国边界的愿望。在第九条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从速派出信任大员查勘，务将双方签订有关边界的条款补入本条约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边疆之争。”

在签订天津条约的那一天，普提雅廷还不知道，在这以前两个星期，俄中东段的大部分边界已经由璦琿条约确定了。因而，天津条约的这一条款事实上指的是乌苏里江地区尚未确定的边界。

然而，中国政府原来想使俄中条约起约束作用、减少英法勒索的打算没有实现，中国被迫在天津与这两个强国签订的条约规定，中国除了支付赔款外（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还允许外国商人在全国自由贸易。英国船只获得在长江上航行的权利，对英国货物不收厘金税，只加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除此以外，英国获准在北京设立常设的使馆，而法国设立临时使馆。

外来干涉范围的扩大和政府被迫向外国人提供的在整个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激愤。清朝军队遵照北京的命令，在一八五九年向英、法公使所乘驶往北京的船只开火。中国政府拒绝批准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此后，英国和法国便加紧准备向中国发动新的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死灰复燃了。

早在一八五九年三月，俄国政府就派了 H·II·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一行（其中有几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军官）前往中国。他负责与中国政府就普提雅廷尚未解决的关于在乌苏里江地区确定俄中边界，恢复俄国商队经库伦到北京或者张家口以及在喀

什噶尔设立贸易站等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军队在大沽炮台对英法分舰队的胜利，使清朝宫廷对自己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能力产生了信心。

然而，清朝政府的希望落空了。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并迅速地向北京推进。清朝咸丰皇帝带着全部皇室人员逃往热河省。北京城里情况危急。

在战争过程中，从一八六〇年五月起逗留在上海、后来在天津的伊格纳提耶夫，竭力向英法代表施加影响，劝他们不要派军队进入北京城，不要坚持在中国首都设立常设大使馆等。伊格纳提耶夫公开表示反对干涉者的掠夺和暴行，反对英国的贸易扩张，这就使人对他产生有别于西方外交家的良好印象，从而引起中国居民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市郊的时候，伊格纳提耶夫到了中国的首都，住在俄国传教士团的宿舍里。清朝的大臣们请求他在中国与英法代表谈判停止军事行动时充当调停人。伊格纳提耶夫同意了。中国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恭亲王（他负责与欧洲列强谈判），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俄历六日）给伊格纳提耶夫的复信中证实了清朝当局关于请他当调停人的请求，并且向伊格纳提耶夫保证，和约缔结后，与俄国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将尽速获得解决。

在与英法大使谈判的时候，伊格纳提耶夫成功地劝说后者作出了某些让步，其中包括不向北京进攻。清朝的大臣们向伊格纳提耶夫表示感谢，声称：“如果没有他，那么欧洲人肯定不会放过洗劫城市的机会”。

和约缔结后，伊格纳提耶夫就有可能与中国政府就俄中问题进行谈判。在这以前，穆拉维约夫已给他送来几张已经拟定的乌苏里江分界地区的地图。穆拉维约夫还向伊格纳提耶夫提

供情况说，俄国考察队在乌苏里江地区仅仅发现一些零星的流亡的中国人，而只是在离海岸四十六俄里琿春河流入图们江的汇流点附近才有固定的中国居民点。穆拉维约夫写道：“这就证明，中国政府承认这些地方不属于自己的领地。”

伊格纳提耶夫与中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在以后的谈判过程中商定，为了确定从兴凯湖到海岸这段边界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是已经完全确定的天然界线，不需要再明确了），将向这些地方派遣专门代表，并由他们编纂这一地区最后的边界地图。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俄历二日），伊格纳提耶夫和恭亲王奕訢签署了一般称为北京条约的续增条约。签字仪式是在俄国传教士团的宿舍里举行的，在这之前，送来了一份中国皇帝的圣旨的抄本，其中称，条约草案是“在应有的关注下”写成的，应该“履行这一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条款”。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俄历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条约；根据双方的决定，批准证书的互换没有进行。

在北京条约的第一条里规定：俄国和中国的东界定为由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汇合处，即“顺阿穆尔下流至该河、乌苏里江汇合处……自乌苏里江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江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琿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由此，阿穆尔河左岸、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东（右）岸和兴凯湖以东的土地属于俄国，而这条线的另一面属于中国。

在条约的第二条里拟定了西部地区，即中亚细亚的未来边界的总走向。在这以前，由于俄国和清朝中国领土互相毗邻，就产生了为解决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为了协商确定俄中边界而在这些地区建立两国正式关系的必要性。

由于确定了极为漫长的边界线，产生了增加贸易点的必要性，以便不仅为集中在中央的贸易，又为边界居民的贸易提供条件。因此，条约规定开放全部的俄中边界(第四条)。

除了在伊宁和塔城已经建立免税的俄中贸易制度外，续增条约的第四条里还规定在新的俄中边界上——沿着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直至图们江，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制度。中国方面再次证实了自己同意俄国商人到北京观光(经过恰克图)，并能在途经蒙古时，在库伦和张家口进行贸易。俄国方面也给予中国商人以“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的权利(第五条)。

在条约的第六条中载明：“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伊宁、塔城)一律办理。”

北京条约中有关陆上贸易的条款和俄中以前签订的条约一样，所根据的是互惠原则，它们与西欧国家和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海上贸易的条件的原则性区别正在于此。根据俄中(北京)条约的条款，中国在互惠的基础上不仅有权在俄国境内进行贸易，还有权“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俄中贸易揭开了新的一页，因为现在不仅能进行陆上贸易，还能进行海上贸易了。在海上贸易方面，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俄国获得了一切与中国根据条约向西方列强所提供的同样的优惠权。

为了履行已缔结的确定国界的条约中的各项条款，还签署了补充议定书，其中附有由两国的专门代表在边界的有关地点所编纂的地形图。

在考察边界线的时候，中国的代表们书面通知俄国代表，“乌苏里江口的边界已划分清楚”，也就是说，承认了卡扎凯维奇在乌苏里江口和下游河套地区建立的边界标志。一八六一年六月，俄国的全权代表滨海省总督 П·卡扎凯维奇和东西伯利亚



# 古西伯利亚

〔苏〕A·O·奥克拉德尼科夫

我和我的朋友们、同事们曾在多年工作中，在锡霍特——阿林山区，在科累马和楚克奇，在戈壁沙漠和外贝加尔草原，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盆地，进行考察工作。我们到处都找到了在悬崖峭壁上雕刻的或用彩色画的图画。西伯利亚人把这些图画叫做“皮萨尼齐”，而考古学者们把它称为岩画。在西伯利亚，这种岩画很多。这些岩画，加上其他考古发现以及手写文物，使我们能对这一带各族人民的生活了解很多东西。

## 旧石器时代——艺术家和数学家的时代

西伯利亚是一个语言纷繁、民族众多的地方。除了属于印欧语系的俄罗斯人以外，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部族和民族，其语言包括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所有分支。这个语系也同印欧语系一样，分布地区广泛，历史年代悠久。这里也有突厥语系民族，包括其最北部的民族亚库梯族，还有蒙古语系的布里亚特族，通古斯族以及芬兰乌戈尔族（汉戴族和曼西族）。最后，在西伯利亚还有神秘的古亚细亚人，如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他们的语言和西伯利亚其他民族的语言毫无共同之处。

西伯利亚这些民族的起源、历史和变迁，百余年来一直是全世界专家们极感兴趣并积极研究的对象。苏联学者们收集并综

合了大量的文献、考古发现、民族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材料以及自然科学首先是地质学方面的材料。集体写作的《西伯利亚史》五卷巨著，就是多年研究的总结，这种研究在十月革命后特别广泛并富有成果。

收集到的事实首先证明，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曾经历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地区，如同已经过充分研究的欧洲一样，也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和青铜器时代等等。在几千年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化上独具特色的、光彩夺目的文化珍品。这里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和邻近地区或国家人民的生活相关联的。在这些事件中，首先就是人类最初开发西伯利亚广阔地区。这一事件仅就其涉及地域之广来说，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远东的结雅河<sup>①</sup>岸上曾发现了经人磨过的砾石，这是真正的劳动工具，其年代不迟于、很可能早于北京猿人使用的工具。同时，在西伯利亚另一端，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在大致相同的地层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砾石工具。

已经完全可以肯定，还在二万五千年前，在安加拉河两岸居住过狩猎毛象和犀牛的猎人。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接近于欧洲临近北冰洋地区该民族的当代文化，但具有其独特风格。

这是一些卓越的建筑师、猎手、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例如，在西伯利亚考古学引以为荣的布列季的出色的雕像上，表现了一种具有特定式样的缝制的衣服，这种衣服和现在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以及爱斯基摩人穿的一样。穿着这种衣服可以抵御北极吹来的刺骨的寒风。

马尔塔和布列季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出色的古代艺术的宝

---

<sup>①</sup> 即精奇里江。——译者

库。毛象牙板上的毛象雕刻，水鸟类，如鸭、潜鸟、天鹅的立体雕塑，巨首蛇的刻像等都闻名世界。妇女的形象代表了旧石器时代雕塑家们技艺的顶峰。这些妇女形象多数是裸体的，她们头上有描绘细腻的各种各样的发式，其中有些和现代妇女的流行发式极其相似。

根据旧石器时代猎人的艺术标本，还可以探索科学思维即抽象是如何产生的。地球上东西相对两地的两位科学家，一个在新西伯利亚，一个在纽约，他们在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创作时都得出了出人意料的同样结论：算术、数学并不是产生于苏麦尔或埃及（如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早在他们一万五千到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西伯利亚和西欧的居民中产生的！那时人们已经会用五和十以及七计数。同时他们不仅会计数，而且是最早地注意到了月相。当时的妇女就是根据月相来计算怀孕天数的。

在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和原始森林对古代居民点和古墓进行的发掘工作表明，即使在北方地带也曾经经历过文化史上连贯的各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大约与此同时，在阿穆尔河<sup>①</sup>流域、滨海地区、叶尼塞河以西以及欧洲北部都产生了当地的独特文化。还在新石器时代（约六到五千年前），在乌拉尔和太平洋之间就已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新文化，产生了整整一个新的世界，更确切地说，产生了几个新的世界！

## 青铜、铁——和平与战争的金属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第一批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sup>①</sup> 即黑龙江，下同。——译者

的。这些国家的历史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自然，也引起了苏联学者的兴趣，因为这些国家是与基辅罗斯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金属的普遍使用使西伯利亚各个部落的生活，首先是居住在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的生活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畜牧业也普遍发展起来。于是产生了新的生产事业，极大地扩大了食物的来源。所有这一切强有力地推动了新型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刺激因素的发展，从而把游牧公社推上了战争和征服的道路。开始了民族大迁徙的时代。

关于最早的民族大迁徙的情况，我们目前还一无所知。然而，较晚的几次迁徙却震撼了东西方定居的从事农业生产人们的整个文明世界。迁徙的浪潮涌到了罗马和拜占庭。于是也出现了残暴的征服者的首领，而他们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历史发展唯一的、真正的标志。编年史记载了他们的大名——匈奴的阿提拉、突厥的克留铁金和孟其岩以及其他许多人。

所有这些事件在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考古文物中都有实物反映：外贝加尔的“石墓”、米努辛鞑靼人的古墓、普吉尔的古墓及其奇妙的艺术珍宝（证明了在人们难以想象的遥远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勒拿河和叶尼塞河岸石崖上的岩画。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有游牧部落的短暂的联合，而且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最初的国家，它们有自己的首都、森严的官位等级以及内部骚动、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斗争。

##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最初的一些国家

在这个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是叶尼塞流域吉尔吉斯人的国家。它的产生与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末期匈奴人的影响不无关

系，这个国家一直延续到对于中亚、南西伯利亚和东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的到来，即蒙古人征服之前，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叶尼塞流域不间断地继续存在了一千多年！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被统称之为鞑鞑人的一些部落遍布远东地区及其毗邻的满洲一带。通古斯的后裔和鞑鞑族部落所建立的渤海王国是当地最早出现的国家，之后又建立了契丹人的国家——辽国，辽国又被建立了金国的女真人所灭。从实力及文化发展的水平来说，金国并不亚于当时的欧洲人。这一点从金国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物中可得到证明。

修筑在乌苏里斯克<sup>①</sup>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山岗上的宏大的防御工事、壕沟和高达五米的围墙，沿着山脊延伸，长达八公里以上。古城遗址内，在以陡峭的天然斜坡为屏障的最高处，是一座“禁城”，四周隔着一道内墙。在这座“禁城”里发掘出许多豪华的宫殿式建筑的遗迹。门前立着刻有图案的石牌。在一座宫殿里约有一百个柱基仍然完好无损。圆柱林立。宫殿是瓦屋顶，饰有龙头，吐着舌头，露着牙齿，用以避邪。

女真人执行的是积极而又独立的对外政策。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统治中国的宋朝。完颜旻皇帝时期，女真人通过同宋朝作战，占领了北京，把从北京到黄河的中国北部广大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女真的统帅们攫取了巨额的赔款——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衣绢百万匹，但他们仍不满足，并于一二七年掳走了两个皇帝——退位的老皇帝和他在位的儿子。为了侮辱傲慢的宋朝，宣布把二帝废为庶人，并把他们掳往女真国。国库、朝廷的档案文献、藏书、帝国舆图、玉玺和宫廷的珍宝玩物，被女真人抢劫一空。

---

<sup>①</sup> 即双城子。——译者

女真人广泛采用前人和邻人的经验，但是对于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发明，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传统。这也反映在他们的建筑学上。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戈鲁宾山岗上的居民点就是一例。女真的建筑师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条件，并因地制宜，使他们设计的要塞的轮廓同自然条件相适应，这一点从宏大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古城遗址这样一些巨型工事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女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力求把房屋盖在人造阶地，即平台上，下面有蹬道或台阶。从伸延至戈鲁宾山岗下的低地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到台阶的顶端，上面有女真人的房屋。房屋中遗留有用石头砌成的火炕，也就是房屋地下的烟道。火炕是本地土著居民的一项巧妙的发明，后来为中国北部和满洲南部居民所采用。女真人的火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火炕很可能是连同全部建筑学原理一道传给了他们遥远的后代和族人——当代的阿穆尔地区部族那乃人和乌尔奇人。

在曾经存在过渤海国和建立了女真国的地区进行考古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很感兴趣的发现。这些发现证明，那里的各个国家一开始就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强大的外来影响。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成长，并不是由于受某种冲突或外力推动的影响，而是适应社会内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学者们的发现可以做出这一重要的结论。

北亚人民数千年来同严酷的自然界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中，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走过了复杂的历史道路，同邻近的和比较遥远地区的人民，首先是东欧人民相互影响，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月《苏联》画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室译）

## 细说清朝(节录)

黎 东 方

### 对 俄 和 战

康熙在解决了吴世璠以后,把目光从西南移到东北,派兵驱逐侵入黑龙江下游的哥萨克人。

在哥萨克人之中,有一个强盗首领埃儿马克,在一五八一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受雇于俄国东部的一个大地主斯特罗冈诺夫,向乌拉尔以东“开拓荒地”。

埃儿马克招了一批哥萨克同类,乘船沿鄂毕河而下,战胜当地的突厥土人,取得西比儿城,用这城作为巢穴,四出掳掠。

三年以后,埃儿马克死于一次对土人的战争之中。其他的哥萨克首领继续他的“开拓”事业:杀人,抢东西,侵占土地,伐木造城,留兵戍守。

在顺治元年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哥萨克首领波雅尔科夫“发现”了黑龙江。六年以后,另一位以残忍著名的哈巴罗夫“发现”了太平洋。

这时候,哥萨克人的大本营已经移在鄂毕河上造于一八五七年(万历十五年)的托波尔斯克城。他们而且已经不再是斯特罗冈诺夫一家的佃户,而已经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开边臣民了。

他们也就自称为俄罗斯人。清朝的边疆官吏于是在报告北

京的公文上称他们为鄂罗斯，又称他们为罗刹。沙皇这一个名词，被清朝的边疆官吏写成“察罕汗”。

与康熙同时的一位察罕汗，是鼎鼎大名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颇想叫康熙对他称臣纳贡。他在康熙九年命令驻在尼布楚城的俄官，派人劝康熙“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敌人之侵害。”

尼布楚俄官所派的俄使在到了北京之后，被康熙的理藩院监禁半个月。期满，他领了一些康熙赏赐给彼得大帝的东西回尼布楚复命。

这尼布楚城，位于今日的赤塔之东，我国肱滨城（满洲里）之北偏西，石勒喀河北岸，尼布楚河西岸。它与黑龙江中流北岸的雅克萨城同为俄人东侵的重要据点。

清俄双方在顺治年间便已有过军事与外交的接触。顺治九年，清方的宁古塔章京、海塞，逐走乌札尔村的俄人，其后被俄人击败。顺治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又逐走深入松花江沿岸的俄人，溯黑龙江而上，打到呼玛尔河河口的俄人营堡，但奈何不了雅克萨城。

俄方先后在顺治十三年与十五年，两度派遣使臣到了北京，但均以国书的措词“矜夸不逊”见不到顺治皇帝，无结果而回。

康熙作事，一向脚踏实地。他在用兵以前，先派一个叫做郎坦的正白旗副都统，带兵去前方伪装猎人，打听敌方的虚实与路程远近。

郎坦去了以后，回来报告：从我们的瑗琿城到敌人的雅克萨城，舟行逆流而上需时三月，陆行只消一个半月。但是运粮食与兵器，仍不可没有船。他说：我们现今已有了四十艘大船，二十

六艘小船，所差的也只是五十艘小船而已。

郎坦又说：敌人的厉害，第一是有雅克萨的木城作为凭借，第二是有枪有炮。我们如果能有新式的红夷大炮二十尊，精兵三千，便不难把雅克萨拿下。

康熙的见解比郎坦更高一筹。他认为攻敌虽易，但不如先造两个木城于瑗琿及呼玛尔两地，储备足支三年的粮食一万二千石。这粮食可以向科尔沁十旗的蒙古人征取，不足之数则从锡伯乌拉的官屯调发。牛羊呢，向索伦族的土人要。两个木城之间，以及通往索伦的五站大路，可设驿站。兵员，应该调宁古塔的兵去两个木城，勤加操练。火器，尽量从北京输运去。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清军在萨布素、朋春二人的统率之下，进抵雅克萨的近郊。清军的实力是：水陆兵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

城中的俄方守将托尔布新从二十三日抵抗到二十四日，死伤一百人左右，在二十五日投降。清军准他率领全体愿走的俄人撤退，去尼布楚。不愿走的俄人被编入满洲八旗。

清军把雅克萨烧了，回军至瑗琿与墨尔根城（嫩江）。

俄方探听到清军已走，在阴历七月间又来，把雅克萨城的废墟占领，在废墟之上造起宽二丈八尺，高二丈的土城，而且从尼布楚运来大炮八门，兵丁八百七十名，仍以托尔布新为守城之将。其后又添了白炮一门，炸弹五百个，兵丁六十六名。

清军于次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再度来攻，战了很久，城内的俄军仅剩下一百一十五人，仍在抵抗。此后，两军长期相持，直到九月间康熙接受俄方的请和，宣布停战为止。

主动求和的不是清方，而是俄方。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派了维纽科夫等两个人，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到达北京，向康熙皇

帝说明愿和。康熙派人到雅克萨，命令清军停战。

又过了三年，双方的全权代表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七月在尼布楚城会面。清方的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带了一万名左右的兵丁与随从作为后盾。俄方的代表是陆军大将戈洛文，所带的兵仅有一千五百人。

彼得大帝曾经密令戈洛文：“雅克萨不妨让给中国，但通商的权利不可放弃。”

同时，康熙也密令索额图：“尼布楚于必要时可以让给俄国，但中俄两国必须至少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的大小支流均应属于中国。”

阴历七月七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于尼布楚城与什耳喀河之间的空地，以帐篷为会所。

俄方代表首先发言，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界。清方代表答复，黑龙江一带，以至于西边的色楞格河左岸之地，一向是清国土地，居民年年朝贡，俄方应该把色楞格斯卡城、尼布楚、雅克萨城，及其全部属地，完全归还清国。

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戈洛文说：清方有什么证据，说明尼布楚以东的地方是清国的领土？倘若拿不出证据来，“任意出言”，没有什么意思。索额图说：俄方定要色楞格斯卡与尼布楚，未尝不可相让，但通商贸易则可，驻兵则不可。戈洛文说，两国应该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大怒，退出了会议帐篷。

过了四天，索额图召集全体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用武力解决。第二天，他率军渡过什耳喀河，在尼布楚附近布阵。

戈洛文一边加紧在城的四周设防，一边委托替清方担任翻译官的西洋传教师徐日升与张诚二人向清疏通，愿意接受清方的条件，请清方不要动武。

结果是，双方在七月二十三日（阳历九月七号）正式缔约。

条约一共是九条，其主要的內容是：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

雅克萨城拆毁，城内的俄国军民迁回俄国。

现住于两国境内的人民，除了雅克萨的以外，一概准许居留，不必遣回本国。今后，持有“往来支票”（护照）的人，“贸易不禁”。至于越境打猎、抢掠、杀人的，一概捉拿，由当地的官吏严办。

自从这尼布楚条约订立了以后，中俄双方的疆界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没有更动。

### 补叙咸丰外患

〔一八五六年，利用广东水师搜查停泊在珠江炮台附近的“亚罗”号走私船事件，英、法侵略军在沙俄、美国的支持下，攻陷我广州。〕<sup>①</sup>

（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偕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提雅廷（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来谈判，否则便来北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以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同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

<sup>①</sup> 方括号〔 〕内文字系本刊为连接上下文所加，下同。

广州战事的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们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额尔金、列维廉、普提雅廷，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额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八国联军”：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了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待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沽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额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借

口,但也老着脸皮,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阴历五月二十号)上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额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额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提雅廷,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日(阴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额、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提雅廷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额、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额、葛、列、普,而是额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仅十二条,已经包括了:(1)最惠国条款;(2)把五口通商的权利让俄国分享,再加上台湾(台南)与琼州(琼山)两港;(3)准俄国把外交文件直接送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不必再经由理藩院。事实上,在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前的十几天,中俄之间已经另行签订了《璦琿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其后的阿穆尔省)拱手奉送,又在原则上答应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其后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间的天津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

国条款”。

中英之间的天津条约，是条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条。

〔咸丰九年，英法公使带了大批兵船，抵大沽口，准备溯河而上，到北京“武装”换约，遭到了清朝军队的严重打击。咸丰十年，联军占天津，直攻北京。〕

联军“狂歌而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额尔金在九月初五（十月十八号）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陆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九月十一（十月二十四号），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俄使普提雅廷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穆拉维约夫用了璦琿条约，轻轻取去。普提雅廷只须在中俄天津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是那负责修约的普提雅廷，而是另一人，伊格纳提耶夫将军。

伊格纳提耶夫是在咸丰九年阳历五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大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沿海州）。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沿海州）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

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

清廷的答复是：请俄国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联军来抢这东北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

伊格纳提耶夫又向清廷表示，(1)准备赠送中国若干大炮与小型武器，帮助中国在大沽口对英法设防；(2)准备叫俄国海军开来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与利诱两重作用。清廷仍旧对他婉辞敷衍。他便转而向英法二使建议：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联军占领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调停。事实上，他的确也劝过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脚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对象。然而英法本就没有把清朝一脚踢翻的意思。

恭亲王年纪很轻，被他一再恫吓，渐渐地感觉到必须先把他打发走，才能专心向英法二使请求，将联军撤出北京。于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签字以后，恭亲王就和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阳历十一月十四号)。

这中俄北京条约共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的第一条最重要，把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美瑛条约有关黑龙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确定，又把原定“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改为完全割让给俄国。

条文说：“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江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江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江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之东属俄罗斯国，二河之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瑚图布河……瑛春河……至图们江口，

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

中俄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新疆的西北边界，以所谓“常驻卡伦”为据，原有的以“边外卡伦”为据的真正边界被无形取消。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白得了大过东北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两国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厉害得多。

## 日本还辽取台

中日马关条约的互换，本规定于次年（一八九五年）阳历五月八号在烟台（芝罘）举行。然而条约之中的割让辽东半岛部分不久便在九月二十二日由日本“自动”取消，以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这“自动”实际上是“被动”。俄、法、德三国对日本提出强硬的交涉，日本才俯首就范。

俄法两国当时在欧洲，为了对付德国，已经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四号结成军事同盟，于是在辽东也行动一致，本无可怪。可怪的是，他们邀了德国一齐对日本施行压力。原来，他们曾经普遍地征求列强的意见，结果英、美态度冷淡，只有德国一国热心，便不得不让德国参加其间了。

俄国这时候的首相（大臣会议主席）兼外相阿来克西埃夫，陆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与财相威特，都是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早就把朝鲜与整个中国东北，算作俄国的未来领土了，于是对于日本之扩张及于辽东，认为必须立即加以阻止。

阿来克西埃夫训令俄国驻日公使于阳历二十号向伊藤博文提出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仍让中国保有这一角的领

土。跟着，法德两国也向日本提出同样的照会。而且，这时候，俄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十七艘兵舰与几艘鱼雷艇，已经调来了太平洋，曾经在中日互换马关条约之时，光临烟台。

伊藤博文于如此的压力之下，只有屈服的一条路，但又怕在中国人的面前丢脸，终于以再加三千万两赔款作为代价，勉强接受俄、德、法三国的“调停”。

这三千万两本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辽东的实际主权在三年以后便转入俄国之手。俄国叫中国向日本“买回”辽东，然后“送给”俄国，中国徒然白白地多赔了三千万两。

俄国的侵略手段真高。它利用“干涉还辽”向中国示恩，随即摆出“救命恩人”的面孔，要求中国向俄、法二国银行借一万万两，汇付日本第一第二两期赔款，而言明以中国关税作押，“由俄国国家加保”。这加保两字，轻描淡写，使得中国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清廷虽则糊涂，也看出了俄国的伎俩，而婉辞抗拒。俄国说，“倘不早付日本以一万万两赔款，则日本未必肯退出辽东。”清廷被它吓住，俯首就范，只不过把“加保”两字改为“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准许银行出面，蝉联发给股票(债票)本息”。

## 中俄密约

为了答谢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还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与俄国合作防日，清廷派遣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顺道访问德、法、英、美。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号)由北京出发，到上海，搭乘法国邮船，到埃及的塞得港，遇见俄国派来的

迎迓专使乌赫唐斯基亲王，乌王请李鸿章转乘预备好了的俄国船，直航黑海，于阳历四月二十七号在敖德萨港登陆，然后就转乘了火车，到圣彼得堡。

俄国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李经方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行馆设在一位对华贸易巨商帕夫洛夫的家里。

这时候，离开加冕典礼还有若干天。俄皇仍在圣彼得堡京城中居住，尚未去古都莫斯科。李鸿章在五月四号递国书，当天下午又被秘密召见一次。俄皇亲自向他提出在中国东北造一条横贯铁路的要求。

事前事后，外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与财相威特向李鸿章花言巧语，说：这一次中日之战，俄国本已出兵帮忙，由于缺乏铁路，所以军队开到吉林附近之时，中日之战已经结束；下次，俄国定必出力。因此，必须有一条横贯铁路，连接尼布楚与海参崴，免得绕一个大圈子，沿着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江东岸走。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曾筑好（预定一八九八年到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这条横贯铁路中国自己可以筑。罗、威二人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专家，恐怕十年也造不成功。如果交给俄国筑，三年就可以了。

其实，俄国也没有钱，要向法国借；俄国也没有专家，要向法国雇。李鸿章那里会知道呢？

俄国而且不惜巨资，划出三百万金卢布（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及其随员。威特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

中俄密约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号）在莫斯科签订。签字的人是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威特与李鸿章。

密约共有六款。第六款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五年（到辛亥年为止，期满可以续订）。第一款规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亦互相接济军火粮食。第三款说明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议和。

密约的第四款，最为重要。“今俄国为将来进兵御敌，并接运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么一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借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入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连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

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象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狴，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这一年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号），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款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一番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

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笼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那里到那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

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

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

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一八九六年九月八号），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家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量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

铁路的真正负责人是谁委派？一字不提。合同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这“一律”二字，把“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变成了第二个“俄国铁路公

司”。

既然是俄国国有的铁路，则轨道之宽狭，自然也应该与俄国的其他铁路“一律”。清廷在事前明白坚持：这中东铁路既在中国境内，应与中国的其他铁路一致。俄方以“中俄密约作废”来恐吓，清廷终于让步。于是合同上便有了这么一句话：“至铁轨之宽狭，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五英尺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中国铁轨的宽度是中尺四尺八寸五分。）

也只有如此，这中东铁路才可以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连在一起，专供俄国运兵运粮食军火，而间接使中国的宽底火车无法“假道”。

为了敷设轨道而需要的土地，本应明白规定其限度，然而合同之中不说。合同只是说，所需的土地如系官地，应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如系民地，则由公司或买或租。

最可恨的，是俄国人阴巧巧地放进了“防护铁路”四字于“所必需之地”五字以前。又加上“经理”两字！因此，第六款的开头一句文字，成为：“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其后，铁路沿线两旁若干英里宽的一长条，都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地产。不仅是公司的地产，而简直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在这横贯吉黑两省九百五十英里长、数十英里宽的地带，设置铁路警察（实际上是军队），大量移进俄国人民，成立属于俄国的地方政府，施行俄国法律。

中国的东北，被这“长带形”的俄国的偷来领土，切成南北两片。

两年以后中俄续订合约，让俄国再造一条纵贯铁路，又把南边的一片，切为东西两片。

铁路合同中埋伏了有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字眼，而许景澄被瞒过。合同华文本第五款中写着：“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

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看来这地方官该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官，而所谓“照约办理”，应是依照以前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之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已。然而不是！合同的俄文本，说：“皆交依据合同所成立之地方政府处理之。”

俄国得设置铁路警察一节，在合同之中没有，却放在“中东铁路条例”之中。条例是由俄方片面颁布的，但中国政府糊里糊涂地不曾表示反对。条例的第八条说：“为保护铁路及‘附属地’之秩序，公司委任警察办理。因此，公司得制定铁路警察规则。”（注意，“附属地”三个字又被俄国以走私方式放入条例之中。得寸进尺，此之谓矣。）

合同之中，关于要“开采”的东西，只提到“沙土、石块、石灰”。条例呢，“公司经中国政府之允许，得采掘与铁路有关或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别项矿业及商工业。”采少量的煤，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火车头需要煤烧，可谓“与铁路有关”。进一步，与铁路“无关”的煤也要开采。再进一步，所有的矿都要开采。最后，任何一项商业工业皆想尝试。

和这些特权比较起来，合同所规定的减收俄国货进口税三分之一，真是微乎其微了。值百抽五，减去三分之一，然而聪明的俄国人，连这百分之三点三的进口税，也不肯缴纳。方法是：在“条例”中规定，铁路沿线各车站，一概免税。（合同之中，原说中国得在铁路线的两端设关抽税，于是，这两端的关也变成有名无实。）

为了造铁路而必须运入中国的器材，当然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搬进来，进口税分文不缴。

铁路的全部收入，如运货、搭客、开矿、兼营工商业，一概于中国政府无干，不仅绝不“分肥”，而也不纳任何税捐。

## 瓜分前奏

俄国在中国东北窃取了庞大利权，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鲜。当时朝鲜的君臣也颇想“以夷制夷”，引进俄国来抵制日本，任命一个俄国人阿来克西埃夫充任总税务司；又聘请了若干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教官，管理朝鲜兵工厂，甚至在朝鲜财政部里面也设了俄国顾问。

不过，日本很警觉。它花了几个月工夫，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国收买。日、俄两国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阳历四月，签订了一件“东京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于是，所有俄国人在朝鲜担任总税务司、教官与顾问的，都撤离了朝鲜。

倒霉的仍是朝鲜与中国。弱者不自己奋发图强，只知依赖他人，结果总是一死。

在甲午之战以后、庚子以前的几个年头，中国国运之艰，史无前例。“睡狮”在列强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静待送终、分尸。

清廷于订立中俄密约及与此密约相连带的“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和“中东铁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入室，惴惴于东北即将为俄国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敌此狼的办法。办法是，赶紧请英国助筑一条由山海关外四十英里地点的中后所到达新民府与营口的铁路。

经过多次的接洽与波折，清廷的国有铁路公司与汇丰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阳历十月十号立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九折实收，年利百分之四点五，以所筑铁路及其他铁路之资材收入为担保，到期如本利欠付，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结果是，俄国直接与英国交涉，在次年的阳历四月二十八号，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圣彼得堡协定，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英国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城以北的铁路建筑权，或妨碍俄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俄国也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建筑权或英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

这个英俄圣彼得堡协定，可说是日、俄东京协定的翻版，同时也是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的一项重要文献。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派兵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第二年，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强租胶州湾作为德国军港，而且还取得了在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等特权。〕

俄国见到德国这样容易便抢得了胶州湾及山东省境内的筑路开矿、投资、卖料、保荐顾问之权，也向清朝进一步要求租借旅顺、大连、辽东半岛，及建筑哈尔滨与旅大之间的铁路。

俄皇尼古拉二世当面告诉中国钦差大臣许景澄，限中国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阳历三月二十七号）以前签约。光绪皇帝接到许景澄的报告，召见李鸿章、张荫桓二人，二人毫无办法，君臣相对流泪，终于如期签约。

这三月初六所签的《中俄租界旅大条约》，一共九款。主要的内容是：租借期二十五年；大连定为俄国商港，外港可行各国商船，内港保留一口，只准中俄两国兵船出入；旅顺定为军港，一概不许中俄两国以外的兵船出入；中国准俄国造一条铁路，把中东铁路与大连湾或营口连接起来。

不久，在闰三月十七（阳历五月七号），中俄之间又订了《旅大租地续约》六款。续约的主题，是租借辽东半岛。这个辽东半岛比当年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略小。界线是：西为“亚当湾”（即复州湾），东为皮子窝（貔子窝）。

实际上，面积不止于此。约中规定了一个所谓“中立地带”，

由西海岸的盖平河口，溯河而上，及于大洋河，然后沿大洋河而下，直至东海岸的大洋河口。

中国不得在“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驻兵，只保留了金州城一城的警察权与行政权。

凡是租借地及中立地带内的筑路、开矿、经营工商业的种种权利，中国均不得让与第三国。

次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月二十八日（阳历五月七号），又立了一件《勘分租界条款》，把租界地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租借地；中立地带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中立地带。旅大以南的庙群岛也视同中立地带。

俄国而且也学了德国在胶州湾的榜样，设立了一个所谓“关东省”，以旅顺为该省的首府，作为其“关东省总督”驻节之地。租借云云，二十五年云云，全是鬼话。

正如在德国所侵占的胶州湾一样，中国无法在俄国所侵占的大连湾（包括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捐。（这一项规定，列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的中东铁路支线合同。）

中东铁路通往旅大的支线，被俄国定名为“南满铁路”。南边的终点，已不是大连湾“或”营口，而是大连湾“及”营口，虽则合同中也规定了通往营口的小支线，应该“于八年后立即拆去”。

## 辛丑和约

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

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了阳历(一九〇一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二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分在东三省。

庚子年冬月十一(一九〇一年一月一号),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五十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号)。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分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今天的瑷琿县县治),攻下瑷琿城(今天的旧瑷琿),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侵占黑龙江省。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琿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依兰)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阿城县),西南的拉林(双城县);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胪滨),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的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宁安)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吉林城),与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在奉天省,副都统晋昌于宣战以后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拆毁沙河站附近的铁路两小段、铁桥两处,打死俄国的工程人员一名。这算是“其曲在我”。事后,奉天将军增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这位晋昌身上,晋昌便成了战犯之一。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蔓延到奉天的义和团分子大举活动,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于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的奉天省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一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分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终极其冷淡。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

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十月四号），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1）惩办祸首；（2）禁止军器输华；（3）索取赔款；（4）使馆驻扎卫兵；（5）拆毁大沽炮台；（6）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经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意日西俄美九国的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骚利斯伯雷勋爵与德国驻英大使哈次肥勒狄特，在阳历十月十六号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1）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2）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3）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4）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借以向中国人民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它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却正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蹕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翹、英年。

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溥静、载濂、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裔。载濂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醇亲王奕詝的儿子。奕詝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而奕訢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历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号），慈禧以光绪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翹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濂已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已于僭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翹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因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

学士)也已在北京沦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在拳乱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聊元、张荫桓,均于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一千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农历七月一号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俄	一三〇、三七一、一二〇两
德	九〇、〇七〇、五一五两
法	七〇、八七八、二四〇两
英	五〇、六二〇、五四五两
日	三四、七九三、一〇〇两
美	三二、九三九、〇五五两
意	二六、六一七、〇〇五两
比	八、四八四、三四五两
奥	四、〇〇三、九二〇两

荷	七八二、一〇〇两
西	一三五、三一五两
葡	九二、二五〇两
瑞典挪威	六二、八二〇两
杂项	一四九、六七〇两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

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一九四〇年之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亦即阳历九月七号，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十二款。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

### 于无声处听惊雷

编者按：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以来，重用一批经美国训练的、被称为“伯克利集团”的经济学家来管理印尼的经济。这些“专家治国派”从美国人那里搬来了一套治理经济的“灵丹妙药”：大量引进外资，拚命发展大工业；推行“奇迹稻种”，大搞“绿色革命”。十多年来，这一套经济政策给印尼的工农业带来了什么后果？美国人斯特林的文章，反映了印尼的一些现实情况。由于印尼“劳动力市场价格低廉，加以政府友好和善，政治气候美好宜人；因此，外国投资者均感皆大欢喜……工商界人士都有如鱼得水之感，仅在去年一年间，便有以三十四家外国银行作后盾的八个新的多国投资集团作出决定，到一九八〇年将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增加二倍。”印尼的“专家治国派”除了给国内外资本家带来更多的财富，把印尼变成了外国投资市场外，对于印尼的广大人民来说，“未能给他们的伙食添加一个卡路里的热量”。

同样，“绿色革命”也没有给印尼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它加速了印尼农村的两极分化，使无地农民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增长。

苏哈托在经济上的失败，加剧了同印尼广大人民的矛盾。一九七四年一月，雅加达就有六十万人参加游

行示威，反对苏哈托军人政权。苏哈托采取法西斯专政的残暴手段，大肆镇压人民群众；八百多名学生、报纸编辑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被捕入狱，十几家报纸遭到封闭。苏哈托在加强国内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不顾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悍然出兵东帝汶，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尘，大搞对外扩张，企图以此转移印尼人民对他的不满情绪。苏哈托的所作所为，只能进一步激化印尼统治集团同广大印尼人民的对抗性的矛盾。“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的这首诗，不也是当前印尼局势的写照吗？

# 印度尼西亚

〔美〕C·斯特林

印度尼西亚失去了无比崇高的故总统哈奇·拉登·苏加诺阁下已有十年了。他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喉舌，洞悉民间疾苦、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守护神，是精神革命的最高统帅，全国足球俱乐部协会的最高领袖，等等、等等。失去了这个人，这里的情形，顿见逊色，就是外国记者，也为之裹足，来此者，寥若晨星，以致地图上画，这样大的一个极富战略意义的国家，何况它还是东南亚倒向西方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并且或许也是最后一块，竟会逸失于人们视野之内。自加诺兄从舞台上消失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景况如何呢？

拿首都来说，面目已大非昔日可比。十年前的雅加达，只是清一色的一片穷陋巷陌，充斥其间的唯有权蔽风雨的毛竹棚舍，臭气熏天的运河，坑坑洼洼的烂泥街道，再加上几处形状奇特、锈烂斑斑的钢筋构架，那都是些有待施工的摩天大厦，它们是准备献给这个国家的神人合一的君王的功德碑。今日的外来游客，不论他在此小作数日盘桓，还是逗留数周，看到的只能是那条有四股车道的高架高速公路，穿越京城的繁华闹市，大街上车水马龙，不分昼夜，沿街林立的不是金壁辉煌的按摩院，就是喧哗嘈杂的酒楼饭馆，或者是霓虹灯光暗红艳紫的赌窟，还有那高高耸立的办公大楼，以及更高地耸立的、使最讲究的希尔顿饭店都不免要自惭形秽的旅馆。

特别使一位西方来客难以察觉的是，他已经置身在东方世界的腹心地带，除了人造皮革制作的玩偶和特制印花布的衬衫外，几乎所有的印度尼西亚的东西都在一霎眼间从视野中消失掉了。

旅馆的客房有一半是空着的。看来，哪怕是旅行社举办的一揽子旅行，包括巴厘岛的洁净无瑕的海滩和异国情调的舞蹈美女在内，其魅力也无法满足本地房地产投机商的奇思遐想。

### 奇 思 遐 想

雅加达，曾经在苏加诺的帝业宏图 and 空空如也的国库（他留下了相当于三十亿美元的外债和百分之六百二十九的膨胀率）的重压之下震颤的雅加达，现已不复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国度的水深火热的首都。千金难买的治疗经济沉痾的回春妙药，印度尼西亚服用了十年，如今它已成为全世界第八名石油大卖主。

照眼下的时价，每天卖出一百五十万桶原油，哪能不令人得意忘形。此间金融界人士，有人本来就已陶醉于奇思遐想之中，于是也就越发地沉入醉乡。但是，雅加达一家报纸的编辑指出，“印度尼西亚要吃饭的人比阿布扎比多”。把一年所得的石油利润全部分摊给它的一亿三千万公民，每人所得也不会超过二十美元，你只要离开雅加达四股车道的高速公路（这可不容易），就看得出来，可叹的是，这笔利润还不是平均分配的。

在首都，有这么一些印尼人，生活的豪华够得上拥有一、二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一次婚礼历时一周，两千宾客坐在冷气开放的帐篷下面，一面品尝香槟美酒，一面从封闭电路的电视机上观赏婚礼仪式。比这个稀有的水平低一等，有少数相对地享有特权的人，他们的收入可以使他们具有“货币身份”（就是

说,买得起一些东西)。除此以外,雅加达的悲惨世界,依然故我。居民五百万,约有半数是棚户中人,他们用毛竹、粗布,再加上敲平了的罐头铁皮搭成栖身之处,没有电灯,更谈不上煤气电灶。臭水运河里,残羹剩饭、死猫死狗载浮载沉,这便是他们饮水、沐浴和大小便的地方。另有一、二百万流浪者,永远是居无定处,市政当局定期用卡车将他们载往本市辖区之外卸下,只不过是听任他们重新流回城市,以便再次打发出去。苏加诺去职以后的时代中的史诗般的变迁,对他们即使有所触及,也是微不足道。“我们的领袖们多半是聪明人,老百姓打心底里都这么说,”这是《大印度尼西亚报》在它遭政府封闭之前的议论(它的编辑英赫塔·卢比斯后来也遭逮捕)。“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为什么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被逐出了市场?为什么我们这些踏三轮车的人,生计要遭限制?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失业?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上学?为什么我们的穷日子总是过不完?为什么?……为什么?”

农村也无多大变化。印度尼西亚十有九人一年中仍然挣不到五十美元,有的一天还挣不到一美分的百分之一,有一半人一天吃不到一千五百卡路里的食物,低于联合国正式认定的维持生命所需的水平。要说他们比苏加诺时期还要穷得不堪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今天又增加了大约四千万人。尽管十三个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新西兰和瑞士)组成的国际财团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拿出了近四十亿美元的援助,尽管印尼政府自己目前正在坐收一笔天外飞来的每年三十来亿美元的石油岁入,但是如此巨额的款项却未能给他们的伙食添加一个卡路里的热量,也未能遏制住他们中间的贫无寸土、无家无业者的人数扶摇直上。

上述种种,听起来也象是这一带司空见惯的故事,其实却不尽然。印度尼西亚的故事说的是一次成功:一次小心翼翼地加以控制的实验室里的实验,这场实验的结果几乎恰好跟原来的计划相符。五十年代早期,世界上的富国着手向穷国传授致富之道,从那时以来全部有关发展援助的概念,究竟荒谬到了何等地步,这儿就是不容推诿的铁证。

世界上怕没有哪一个穷国得到过和采纳过如此大量的有关这些方面的专家意见。苏哈托将军领导了一九六六年的军队政变,此后就领导着这个国家。他全力支持那些专家的意见。他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甘心情愿地将那些折磨人的建设复兴的难题托付给一个美国训练出来的优秀的经济学家班子:伯克利集团。这儿的人都这样称呼他们。他们的头领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里才学出众的维佐约·尼蒂沙斯特罗教授。他们这一小伙青年书生都曾逃脱苏加诺的统治,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赠金,就读于哈佛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也有就读于伯克利的。这门学问的最时髦的新花样中也许还有什么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为了要学到这些东西,他们从一开头就集结了几十个各国的专家在他们身旁。这些专家中有的向世界银行商借的,有的是该行独自派驻当地的一批为数可观的业务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一大批常驻人员,还有一个由美援赠与经费、权势非同小可的哈佛大学顾问组,这个顾问组甚至可以列席内阁会议。

他们干出了轰动一时的成绩。苏加诺积欠的庞大债务,已经重新安排好到本世纪末还清;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的梦魇已成往事;每年的增长率持续稳定在百分之七、八;预算结余正在逼近二十亿美元;外汇储备突破了二十五亿美元的大关;私人投资已达三十亿美元左右。因为这一番成就是在那笔意外之财,即世界石油价格猛增三倍之前就取得的,又因为它如此迅速地

度过了接踵而来的席卷世界的通货膨胀的惊涛骇浪，所以也就显得格外受人珍视。纵然去年的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高达百分之四十六，不禁使人回首往事而心有余悸，但是它已被压缩到百分之十二，使得人心大定。一则是理财有方，成效卓著，令人安心；再则是劳动力市场价格低廉；加以政府友好和善，政治气候美好宜人，因此外国投资者均感皆大欢喜，撤回投资者，迄今仅有一家蜜丝佛陀公司，因为它无力与走私进口的该公司自己的产品竞争。工商界人士，都有如鱼得水之感，仅在去年一年间，便有以三十四家外国银行作后盾的八个新的多国投资集团作出决定，到一九八〇年将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增加二倍。“这地方转眼间就要成为另一个香港”，一个热衷于投资的欧洲人这么说，人人都会各得其所，那是不在话下。

## 分担贫困

弊病的存在是意料中的事，贪污之风盛行到令人有谈虎色变之感。一度曾是内阁副总理的哈达曾经说过：“贪污已成了一门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曾经建议，教育部文化总署不妨设立一个贪污科）。笔者行踪所历，只有在印度尼西亚才能够取得一张“关节开销”的收据，这笔开销是指无法逃避而必须破费的贿金。试举几例以说明其用途：要使小孩被录取入学，装设一具电话，申请一纸驾驶执照，打一场高尔夫球，向计划生育诊所领取免费的避孕套，要求海关放行一批货物，甚至于向政府机关的出纳员领取支付职工工资的现金，都要用行贿的办法。你只要想一想政府雇员的收入，也就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了。试以一位身居部里的显要职位的大学毕业为例，他每月净得二十六点九五美元。新近一次调查表明，没有一个文

官的官俸足够养家活口。苏哈托总统去年许下了宏愿，要亲自出马，消灭贪污。他为了杜绝弊端而采用的方法是将各等官职的薪俸增加一倍，对关系重大的财政部里的官员的工资则一举增加到百分之九百。该部的税务官仍然毫无惧色，收取贿金，一如其旧。（一位雅加达的工业巨头新近为政府的调查委员会传召，被迫交出了两套账册，他说：“诸位都知道，我确实付清了税款——只是没有付到你们手里。”）

不过，总的说来，工商业界已经把这种贪污受贿看作是经营成本的一个固定项目，平均约占成本的百分之十五，“一种免征所得税的生活补助金”，一位美国厂主这么解释。在这一点上，谁都不会指责伯克利集团，在政府里任职的人士中，恐怕只有他们这班人是公认的两袖清风。但是不少的印度尼西亚人对于这一批过得硬的廉洁奉公、干练有为的谋士们的不满之处，却是为了一件重大得多的事情：他们在重新整顿那个病入膏肓、束手待毙的经济的过程中，却把穷苦人置之度外。

这种失察的情况在发展中世界里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不同的是，恐怕没有一处地方比这儿更难予以矫正。印度尼西亚的穷苦人民分布在这整个群岛上面，这群岛占去了从东南亚大陆到澳大利亚之间的大洋中的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全国共有一万三千个岛屿，其中大约三千个是有人居住的，半数岛屿只能依靠顺风驶行、无法在风里掉头转向的帆船。全部居民包括了三百个种族群体，使用着二百五十种各不相同的语言。有的岛上每平方英里只有三、两个居民。爪哇是五大岛屿（其余四个是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西伊里安）中人口最稠密的一个，每平方英里有一千五百人，超过了孟加拉国。事实上，在面积不到全国七分之一的爪哇岛上，居住着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八千万），每年还要增加二百万人。

大概在二十个爪哇人中有一个是“略有一点”的人，他大约有六英亩土地；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是占有土地不到一英亩的“聊胜于无”的农民；其余就是“一无所有”。

爪哇正在陷入灾难而无以自拔，因为它的“分担贫困”制度正在土崩瓦解，这种制度正是人间安排的一切制度中最浪费人力的一种。分担贫困，历来所指的就是一户“聊胜于无”的农家，占有一英亩的稻田，加上超过十个以上的勤勉家庭劳动力，在收割的时候还得雇用额外劳动力。不久前在中爪哇的一个村子里看到，在一公顷（约合二英亩半）的一块土地上，有九百四十七人在劳动。收割稻子的老规矩是把稻田开放给村子里的“一无所有”者，每人带来一把小小的镰刀，那玩意儿叫做“阿尼—阿尼”，小得可以放在巴掌里。“阿尼—阿尼”之所以要如此小巧，那是为了让它在割下圣洁的稻谷的穗头之前，不致惊动叫做德维·斯里的稻谷女神。因为它是用来一次割一根稻禾的，它自然也就成了人类使用的最为耗时费力的工具了。一个“一无所有”者，从早到晚用一柄“阿尼—阿尼”参加劳动，或许可以挣到一把稻米。直到最近，爪哇大约有一半稻子是用手工舂米的，这样就使得“一无所有”的妇女们又能挣到几把粮食。突如其来的灾难是由于已经达到如此辛酸的地步的分担贫困的老规矩，也承担不起那扶摇直上、有增无已的“一无所有”的人数了，他们当中既有生来一贫如洗的，也有绿色革命的受害者。

农业的“进步”也好，别的什么“进步”也好，在爪哇都不是简单的事。在爪哇的青翠茂密的稻田里，现在几乎有一半是种着奇迹稻种，虽然这个稻种可能“与众不同”，但它使稻米的产量翻了一番。新的稻种需要大量肥料，肥料是靠石油生产的，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而且货源奇缺。印度尼西亚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幸运，因为它有石油美元，但每年也得花掉其中

的将近五亿作为津贴，以平抑国内的肥料价格。（尽管有石油可供出口，不失为是它得天独厚之处，可是它仍然得进口所需要的肥料的四分之三。）即使如此，肥料也是难以到手，有物质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爪哇农民有时候要徒步走上二十英里去买肥料，小一点的农户没有买肥料钱，只有向乡村里放债的财主（他们索取百分之二十五的月利）告贷，因而债台高筑，最后还是参加到无地农民的队伍中去。他们的人数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爪哇的几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小农户已经被大农户和新近发财的不在地主并吞掉了；专家们预计，爪哇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今后一代人的年月里都将成为无地农民。

同时，爪哇人正在迅速失去他们最后一条艰难的谋生道路。大农户把没有收割的庄稼出售给商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商人们雇用的帮工使用正常尺寸的镰刀收割稻子（奇迹稻种来自外洋，稻谷女神似乎并不介意）。大农户还能够使用廉价的日本机器，代替农村里“一无所有”的农民来磨谷舂米，可以节省一半的开销。由于“进步”所带来的双重打击，使爪哇的“聊胜于无”的人们每年被剥夺掉的工作，已达一亿二千五百万人时。单是日本磨谷机就叫那么多贫苦无告的农家丧失掉一百二十万个农村就业机会，造成他们一年五千万美元的损失。

这些数字之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它们令人发指，而且更是因为它们令人哀叹。印度尼西亚政府去年几乎恰好花费了同样的金额（四千三百六十万美元）用于全国农村失业救济。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政府估计，到一九八〇年，“必须”提供的农村就业的数字，不多不少也是一百二十万。此间还能继续刊行的少数几种报纸的编辑先生中，有一位评论说：“到那时，爪哇的人口将又增加一千万，其中有二百万，或者三百万，以至四百万将是降生在雅加达，他们要加入到几百万无

家可归的流民中去，这批人是本来就在那里生活的，如果你认为那也算是生活的话；那样一来，爪哇人可就更接近于来一次宗教狂热的大发作了，因为他们准备好要恭迎传说中的拉杜·阿迪尔，也就是正义天王的降临人间，他们恭候天王御驾已经很久了。”

## 清 洗

令人心焦的爪哇问题，还透露了此间制定发展计划的工作中存在着荒谬绝伦的畸形现象，民间怨声载道，已呈难以收拾之势。去年一月，雅加达有六十万人拥上街头，行凶逞暴，苏哈托政府破天荒第一次领略了刚刚开始造反作乱的滋味。为首作乱的是学生，打的旗号是抗议日本金融势力的过分膨胀（当时正值日本首相前来国事访问）。但是，象脱羁的野马一般在街上横冲直撞、无所不砸、无所不烧、厉声呼号、骂不绝口的暴民们，大多数是雅加达一无所有的穷苦人。

此次骚乱，突然终止了军队和全国知识界名流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年前，苏加诺被推翻以及在他周围布下天罗地网的共产党被一网打尽那个时候。苏哈托总统岂能忘怀学生们当年跟他精诚团结，那是在一九六五年，苏哈托肃清了拥有三百万持有党证的党员和一千五百万左右追随者的共产主义运动——杀人三十万，逮捕入狱者又有数十万，这还不过是此次镇压的部分数字。

时至今日，街谈巷议，经常有人议论苏哈托对付骚乱的行动，失于过猛，也许他确是如此。虽然他还决不是漫画里面加以夸张的那种飞扬跋扈的独裁军人，然而也毕竟是一位十年前对这里的共产党大开杀戒的铁石心肠的将军；况且他还是个爪哇

人。苏哈托的智囊班子、战略研究所里的林秉基告诉我说：“在爪哇的家长制的价值体系中，一位领导人得象一个严父一般地受人尊敬和绝对服从。即使你必须批评父亲，也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批评他。公开批评苏哈托就是损害他的权威。对一个爪哇人说来，那就非要立即引起反响不可；没有邪恶的势力隐藏在他们背后，他们怎敢批评他呢？所以，一定有邪恶的势力隐藏在他们背后；这样一来就要出事了。”

果真就这么出事了。一月暴乱使苏哈托不胜恼怒，也不胜惊慌（特别是因为在相去不远的泰国，闹事的学生把那里的军政权推翻了以后没有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出了这个乱子），他立即把八百名学生、编辑和知识界名流投入狱中，并封闭了十多家报纸。苏哈托还处理了一批他的“智囊将军”（这个称呼出自此间一位外交官之口），第一个被开刀的就是他自己的第二把手，声望很高、才智出众的苏米特罗将军。他是权倾朝野的“维护安全秩序行动指挥部”这个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负责在全国进行不断的反共“清洗”。苏米特罗将军还是一位得力的互通情况的联系人。在苏哈托总统看来，他显然是过分的善于此道了，要不然他在处理一月暴乱时实在过于克制。

另外还有几种类型的智囊人士，不是悄悄地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就是狠狠地栽了跟头（其中最突出的是风度翩翩、颇有修养的前任驻华盛顿大使“柯柯”·梭埃雅特莫柯，他的护照被没收，也可以说是被软禁在国内了）。然而，苏哈托总统本人同时也在若干方面设法安抚心怀不满的城市知识分子。例如，他下令要加速对外国企业的印度尼西亚化，导致最终本国人员要居于多数的控制地位；他也下令不得有过于引人注目的消费行为，其结果是有几位百万富翁把他们的罗尔斯—罗伊斯豪华轿车上交政府。

可是，苏哈托却仍未能使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消费者缴纳任何值得一提的税款。我在这儿所见到的人中，谁也不象会相信苏哈托所做的事情已经起了多大作用，使他能够同学生和知识分子重修旧好。当然，谁都说不准。“学生对苏哈托没有仇恨，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的。在我们的国家里，民意测验是犯法的；学生们都不说话；就算他们敢说，我也不敢把他们的话印在报上。”这是一位编辑说的，要是我说出他的名字，那末他也无疑要跟他的许多同行一样锒铛入狱。

### 痛 定 思 痛

去年的暴乱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也引起了反响。伯克利集团在和它的世界银行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和协调外援的援助印度尼西亚各国政府小组里的亲密伙伴们的会商交谈中，已经缓慢地开始露出了批评性的自我检查的口气；苏哈托政权中另外一些向来语含讽刺的人们，首先是那些本来就不把伯克利一派当作一回事的人，口气也更加显得尖酸刻薄了。后面一类人多半聚集在战略研究所的周围，该所的主将阿里·莫埃尔托坡将军本人，一般说来，是没有人把他当作一员“智囊将军”的。莫埃尔托坡将军早年就是搞特务工作的。他把多年的秘密警察的经验和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搞出一套新的苏加诺式的仪式和口号，来为一个叫做“戈尔喀”的全民政治运动服务。这个运动有军队保镳，安全无虞。这个智囊班子里也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深谋远虑之士，他们苦心孤诣地要借助一些更有远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使军队和学生以及民间的其他知识分子的联盟能够破镜重圆。林秉基就是这样一个谋士，他指出：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里，过分地集中

发展大工业是愚蠢的。他告诉我：“我们必须避免印度所犯的惨痛错误，过多优先考虑重工业，对农业考虑不够。”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人员，至少就这一点而言，是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的。这些人正日益察觉，起死回生未必非要靠计算机度量的增长率不可，也不在于工业上的越大越好，也不在于一厢情愿的要在印度尼西亚搞一个规模宏大的自动化的香港。沿着这样的路线搞发展，不论你搞上多大的规模，对于大体上都是文盲、非常接近于赤贫状况的一亿三千万人口，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到本世纪末，人口注定要增长一倍，而现有的人口中就已经有百分之四十是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受过教育的有高中或大学文凭的青年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六十，而许多所谓“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当旅馆里的仆役）。

然而，看一看政府在今后五年期间准备兴办的事情，你想不到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么大的麻烦事情。其中有价值十亿美元的采铜综合企业，它将雇用大约六百个工人；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厂，可以雇用数千个工人；一项全自动化的麦克森—罗伯茨工程，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甜炼乳厂；还有一项美国铝公司的炼铝厂工程，预期投资十二亿五千万美元，可以解决二千人的就业。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内通讯卫星，预计要耗资五十亿美元，还不包括地面转接系统，将在明年升上印度尼西亚的太空，恰好赶得上一九七七年的总统选举。

## 神通广大

上述种种，并非全是伯克利集团的成绩，在经济问题上，它一度享有的不可一世的权威已经随着石油收入的上升而相应地步步下降。想当初，印度尼西亚无以自立，唯有依赖外援，政府

遇事不假思索，都去求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人员，分配外援的大权是他们一手把持的。时至今日，分配外援的权力也不是那么了不起了：虽然援助印度尼西亚各国政府小组不顾印尼的石油收入节节上升而仍然在去年度凑集近十亿美元的援助，但其中有不少的贷款，附有惹人恼火的条件。加之以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在这里根深蒂固，国家计划委员会少不了招惹了一些冤家，特别是新出现了一个跟它分庭抗礼的金融权力中心“珀塔明纳”，这是伊卜努·苏托沃将军创建的国营石油托拉斯。

伊卜努将军多年前放弃掉他的年轻有为、前程远大的行医生涯，投身于锦绣前程的、远非医师可比的金融事业而大显神通，他是印度尼西亚的首富，居家恬静自适，安富尊荣，经常周旋于全世界最高层的银行巨子之间，俨然是王侯气派。多亏他的天才，甚至在世界石油价格直冲云霄之前，“珀塔明纳”就已成了国中之国。他发明的跟外国公司实行“生产分成”的公式果然是灵验非凡。他不但因此而为“珀塔明纳”保全了全国石油的经营控制，并且还开办了几家炼油厂，建立了遍布各地的分配网和一支拥有八艘油轮的船队，他自己经营两家航空公司（拥有的飞机超过了国营的“加鲁达”航空公司），还从事于土地开发、住房建筑、汽车游客旅馆、石油勘探和在巴塔姆岛上的一处工业和旅游事业的宏大发展计划。直到去年，他在国外的信誉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可以一举向外国银行借支二十亿美元而不必问一声有无政府的担保。

不仅如此，他在国内的声势之大，就连政府对于如此巨额的借支也未必得知其收支详情。直到近几个月以前，“珀塔明纳”的账册事实上是任何外人都无法知道的秘密，对整个政府是如此，对名义上恰好是主管“珀塔明纳”的矿业部尤其是如此。政府只是在从国际银行界听到风声，说伊卜努将军透支过多以

后才插手进去承担了他的短期债务，暂时停止他继续举债，同时设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对他今后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督。尽管有这种种新的控制，“珀塔明纳”资本周转额仍然接近印度尼西亚全国预算的一半。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伊卜努将军。他虽然举止优雅，令人倾心，但是，他的雄心勃勃自然也有其锋芒毕露之处，在有一些人看来固然是不胜惊羨，在另一些人看来则不免不寒而栗。他足智多谋，精力充沛，具有企业家创业开拓的能力。近数年间，也正是他左右逢源、大显神通之时。几年前，当伯克利集团、世界银行和援助印度尼西亚各国政府小组只要说一声“不”，那就硬是一个“不”。三年前，伊卜努将军要出资四千万美元兴建一所化肥厂，不幸，他们就是对他这么说的。现在却又不能不让他兴建一所耗资一亿八千万美元的化肥厂。时至今日，“珀塔明纳”已是大权在握，一年三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又几乎翻了一番。苏哈托政权自也无需听人摆布。林秉基说，“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你们的人在这儿。”他指的是美国。“我们需要你们的专门知识，爪哇人特别需要到处都有朋友，方能觉得安全无虞。不过，我们现在是更有选择的自由罢了。”

他们也确是这样。据世界银行的一个职员告诉我，苏哈托政府正在悄悄地削减过分庞大的外国专家的人数——这种做法，是好是歹，则是一个容许争议的问题。很难证明，富有国家的世界里的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已经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穷国的最富爆炸性的问题：为如此众多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就业，他们当中的“略有一点”和“聊胜于无”的人们正在我们的眼面前沦为“一无所有”者。印度尼西亚人靠他们自己的本事来处理这个问题，又会搞得多好，或者搞得多糟，这还得拭目以待。国库要满足的要求是如此之多，伸进公家钱柜里来掏钱的手又有那么

多，再加上那些笑吟吟的推销商人的胀鼓鼓的皮包里装来了那么多令人垂涎的广告小册子，这个问题自然也不会吸引人脱下身上的衬衫来打赌。

## 颠簸的前程

不论苏哈托总统作何抉择，他绝对不象是会跟他的西方的（和日本的）朋友们分道扬镳、自奔前程的样子。他在爪哇人当中也算得上是特别地崇信吉凶祸福都是上天命定的一个人了（他经常有三位神师随侍左右，没有他们说一声徵兆吉利的话，他就不会有任何行动的），他需要到处都有朋友，方才觉得安全无虞。况且，象他这么一个毕生战斗、残酷无情的反共志士，还特别地需要（在这些日子中这种需要更迅速地增长）得到朋友。印度尼西亚地处共产党中国和新得势的共产党越南的正南面，仅仅十年以前，它自身就几几乎沦于共产党人之手。

从那时以来，苏哈托一直以审慎而疑惧的目光注视着在它左近的世界上的那几块多米诺骨牌。印度尼西亚的反共邻居，或者退而求其次，它的非共产党邻居，已是日见稀少，它只跟一个号称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松散地结合起来的团体有正式关系，在这个集团里面的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它和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也完全是非正式的。虽说印度尼西亚已经在本地区，或者远远超出这个地区之外，受到了相当大的尊重，但要说到它的最根本的防卫安全，它还是本能地要仰赖于美国。美国在印度支那溃败以后，苏哈托还能对美国有多大的指望，这又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处在他的地位上，可供选择的途径毕竟是不多的。

同时，苏哈托也不能单靠他的热情的祈神佑福和华盛顿的

恩眷隆厚，就可以当上终身总统。报刊传闻，则有说他热衷于此的。他本人眼下仍然是个超群绝伦的人物，政权的缺点也好，内部的纷争也好，一直还是局限于他下面的一批将军之间（有的是智囊人物，有的不是）。但是，大权在握，恋恋不去，总少不了前程的颠簸。

苏哈托的前途如何，大体上是取决于石油。印尼的石油是含硫少的优质品。印尼的国外收入的四分之三和全国税收的将近三分之二都来自石油。这儿的石油勘探“成功率”异乎寻常地高，勘探工作也正搞得热火朝天——今年花在陆地勘探和海面勘探的费用将达七亿五千万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增长的势头理应很可以维持一个时期。雅加达的有见识的估计认为，到一九八四年，石油产量将会从目前的每天一百五十万桶增加到二百二十五万桶。不过，姑不论其是否确实如此，这究竟只是个估计而已。而肯定无疑的一点倒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油田，苏门答腊的丛林中的米纳斯的德士古公司的油田，全世界仅有的二十二个产量超过十亿桶的油田之一，已经开始枯竭。而迄今为止，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以及西伊里安发现的较新的油田，规模较小，可供采油的期限也比较短。就已知的蕴藏量来说，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也只能再开采二十来年了。印度尼西亚要解决掉它的那些如此巨大的问题，这点儿时间是不算多的，因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以内，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亿名公民就要呱呱坠地。在石油枯竭之前，印度尼西亚人的耐性也会枯竭吗？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你有什么办法能说得准呢？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美国《大西洋》杂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吕尹、卓洪译）

## 现实改变了欢乐的情景

〔英〕D·戴维斯

平心而论,除日本之外,在东亚国家中,印尼的短期和长期的前景可说是最光明的。在发展潜力上,它可以说得天独厚:有廉价劳动力的巨大储备,人口数超过一亿三千万;有富饶的自然资源,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不但出产大米、木材、橡胶、咖啡、茶叶和香料,还蕴藏着诸如锡、石油(印尼是世界第八位石油输出国)等丰富的矿产。事实证明,它的人民对最新农业技术是颇能接受的,工业上也是如此。在现政府的领导下,它连续几年保持了生产上的高增长率。这个政府在一个集中表现了殖民统治的后遗症(狭隘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极端化和动荡不定)的国家里取得政权以后,稳定了经济,并真正赋予这上千个星罗棋布的岛屿以一种整体的印尼国家观。

一九六五年时,故总统苏加诺使印尼陷入到可怖的经济状态。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年的财政年度中,通货膨胀率高达令人头晕的百分之六百五十,从油井到公路,从种植场到灌溉计划,整个经济濒于崩溃。我们应该以此来衡量现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在一九七四年三月结束的被称为“里佩利拉”I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已经重趋安定。这一时期的重点放在币制改革、基础结构的修复以及总的稳定方面。从一九七四年四月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是雄心勃勃。因为“里佩利拉”I号计划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百分之四到五,而一九七三年的实际

增长率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七点五。

印尼的“新秩序”在海外能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总数超过三十七点四八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今天，援助印尼的国家集团已答应提供九点二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十点八亿美元的输出贷款。同时，印尼对外国私人投资给予有条件的欢迎，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年中，外来的总投资数几达四十亿美元，参与了近八百个工程项目的建设。在过去三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多，同期，每个人的平均产值从一百六十三美元增加到一百九十美元。

石油富源使一个已在健康成长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七四年七月，印尼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把油价从每桶二点九二美元提高到十二点六美元，使政府的岁入及其出口收益翻了一番。但是，一亿三千万的人口意味着石油美元只能使每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二十美元，而石油提价以来的世界通货膨胀又使之减少到六美元。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筹划中的印尼重点建设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里，可以说是最动人心弦的计划之一。政府和民间的各项工程或投资计划的总金额为二百亿美元，大约相当于这个国家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些项目有的已初步施工，有的正准备上马，有的在筹措资金，有的还在设计阶段中。其中包括水稻种植场、大型灌溉计划、改善通讯系统、石油化工工业、港口扩展、化肥厂、水泥厂和一个曾一度被废弃的苏联援建的克拉卡坦钢厂的扩建计划，以及一个由日本资助的巨型水电设施，其电力将供应一所大型炼铝厂。与此同时，依靠政府基金、本国资本和外来投资，保健事业也正在工业化的大道上迈步前进。

这个国家曾经受到珀塔明纳危机的打击。但现在看来这是一次有益的冲击。因为它不仅表明了国际上那些精干的海外银

行家们对印尼的信任,同时也导致了珀塔明纳经营上的改进,并使中央政府在财务上加紧了对它的控制。

珀塔明纳的财政危机也显示出了印尼的某些困境……使社会产生分歧的基本争论是关于发展的策略问题。印度尼西亚杰出的计划工作人员自然试图避免那种集中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而致力于发展农业,以使印尼能在粮食上达到自给。事实上,由于石油美元涌入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这不仅是由于适当地抽紧了银根和必须用这份额外收入去偿付珀塔明纳欠下的外债,也因为去年有大量大米进口的缘故。尽管有了工业化和石油繁荣,农业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

对七十年代初没有扩大水泥和化肥生产的决策有许多批评,因为计划人员当时倾向于从国外能得到廉价的供应,并认为农业教育和扩展计划以及大众指导计划和大众加强计划将需要推行许多年才能教会农民使用新的高产水稻品种。但由于农民学得很快,这样就低估了国内对化肥的需要,当化肥在国际市场成为昂贵的短缺物资时,对化肥的需求上升了。

同“技术治国派”对垒的是一个无定形的集团。其中自然包括印尼的一些最有才能、最进取的官员,诸如伊卜努·苏托沃和精力充沛的雅加达省长阿里·西迪金。他们还得到另一位将军阿里·莫埃尔托坡的支持,这位将军不仅是印尼情报机构的首脑,而且还掌管着这个国家中首屈一指的“智囊团”——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这个集团要求尽量减少控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吸收外资,并主张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特殊联系(不仅是经济的)。这一集团还反对抑制印尼境内那些弱小的、而经济上则强有力的华侨团体。

印尼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按其轻重缓急,排列如下:

1. 增加就业机会：按照各种估计，失业与半失业的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到三十，政府必须最优先地增加就业机会，但这又同实现现代化的本愿是格格不入的。

2. 人口问题：印尼一亿三千多万的人口仍以每年略高于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着。由于愚昧无知和宗教障碍（特别是在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各种家庭计划的方案是欠缺的。

3. 粮食问题：虽然土地肥沃，印尼仍不得不耗费一笔难于接受的巨额外汇用于进口大米。

4. 政权的“文官化”：印尼军队仍掌握着大权。一旦时机成熟，要军人交出其所掌握的权力时，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将可能影响印尼。

5. 发展政策：在城市知识分子和上层领导阶层之间，关于经济发展方向，尤其是外资的作用方面的不同意见之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变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在政府和军队内部或者在二者之间，都缺乏相互的协作。

6. 移民：爪哇拥挤不堪，在仅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七的土地上，居住着三分之二的人口。爪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五百八十人。与此相比，全国的平均数是六十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现有的移民计划是不够充分的。

7. 腐败：贿赂始终折磨着印尼社会。最近，苏哈托总统把政府职员的薪俸增加了一倍。希望能缓和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只有行贿才能得到执照和许可证，而买通权贵就可以不受投资法的拘束。只要这种状态不改变，外国投资者将继续对进入印尼持保留态度。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远东经济评论》 上海市前哨农场国际时事评论组译）

## 拴住企业老虎

[英] D·科金

“珀塔明纳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大王曾经这样自夸过，这是和石油大王的身份相配的。人们指责道，作为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最宝贵的资源直接负责的人来说，这是丢脸的阔绰。可是一般说来，伊卜努·苏托沃引起的不是敌意而是敬畏；有人提出“在自行车经济中，怎么会有罗斯·罗伊斯<sup>①</sup>？”这样的问题。他在企业上的成功和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发展，使许多记者忘记了那种亚洲地方病式的贪污腐败的痕迹，而简直要使用类似“光芒四射”、“势如破竹”这样一些赞美的颂词。通常总是限制奉承拍马的雅加达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名流比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更有资格来评价珀塔明纳和它的经理，然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还是把苏托沃看作或许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而且经常不加掩饰地把他说成是“仅次于苏哈托总统的人”。但事实证明，那是非常错误的。

健忘而勇往直前的(或者说直到今年看来是如此的)陆军中将伊卜努·苏托沃博士，虽然已六十一岁，瘦小而全然不象一个典型的工业巨子，却看来命里注定要攀登权力的顶峰。作为珀塔明纳的董事长，他把这个企业搞成为批评家们所抱怨的水泼不进的“国中之国”。多方面的成就为国民石油公司赢得了一个

<sup>①</sup> 自行车经济指小规模经济，罗斯·罗伊斯是制造“协和”式飞机的公司名称。——译者

“国民发展公司”的更伟大的称号，在这个过程中，苏托沃成为只对苏哈托负责的人物。在雅加达的特权阶层中，苏托沃聪明地分赐石油犒赏，他手中掌握着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的“大量的军事借据”，苏托沃在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珀塔明纳建成东南亚最大的金融帝国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多大的障碍。

印度尼西亚和邻近地区是没有人能够和这个巨大的集团相匹敌的。十年间，珀塔明纳不仅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石油联合企业，包括从勘探和生产直到提炼和交易的一切领域，而且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联合公司，包括钢铁、石油化工、化肥、液化天然气、农业、造船、航空、保险、旅行、不动产和建筑。它是世界上二百个最大的公司之一，近两年又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借债企业的一员，原因是珀塔明纳需要一股不断增长的借款源流来为它自己危险的高速度增长和总统指定的一批项目提供资金，这批项目包括修建办公大楼，创建稻米种植园和一座钢铁厂等。国际上的银行家们眼见珀塔明纳是一个石油宝库，一个飞速成长的王国，而苏托沃就是珀塔明纳的化身，甚至他的活动远远超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被一些人看作是印度尼西亚的化身，国际上的银行家们是不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的。苏托沃照例也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为了处理包括旧债和新贷款增长中的债务，他的签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短期贷款和续订合同的署名线上。

只要这只金融之舟平稳地漂泊在海上，就一切都很好。一九七四年的下半年它开始严重倾侧，计划的过重，债务的增多和无力偿还的短期贷款，使它受到浪潮的冲击。一九七四年中期国际金融市场的紧缩，使得珀塔明纳已不可能为它的短期贷款筹集资金，或者切实地调整所有的债务。银根紧使它尤感困难，因为几年来大多数珀塔明纳的贷款都是短期的（三百六十天或者更

短),以避免政府不一定批准的(也许就是受美国教育的“技术治国派”集团所反对的)长期贷款。造成越来越大的危机的另一些因素包括:由于浪费、贪污和腐化,据说在一些百万元以上的合同中,多付了两倍或三倍的钱;由于贪得无厌的多种经营和扩张造成的不负责任和财政上的轻率;再加上普遍的过度铺张和管理失当。可就是没有人说是由于印度尼西亚过低的水准使珀塔明纳缺乏天才、能力和效率。

苏托沃看到困境逼近,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去见苏哈托,告诉他一九七四年石油收入中的四分之三将无法交付给政府。他所据的主要理由是,移交给珀塔明纳的一批项目之一,西瓜哇正在建设中的喀拉喀托钢铁厂,需要一大笔现金付款——珀塔明纳在一年的时间里要付出大约九亿美元。一直很欣赏珀塔明纳的成就和能干的哲人态度,也鼓励过它向各方面发展的苏哈托,表现出忧虑重重,但毕竟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到一九七四年三月财政年度结束时,珀塔明纳在三个季度里,从国外承包人生产部分的收入和本身净收入的应付所得税中扣下了总计八亿五千万美元。政府实际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的石油收入中,收到二十六亿美元(为所有非援助的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不包括未入国库的八亿五千万美元。

这仍不足以使珀塔明纳摆脱困境,真正的危机是在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由于银根紧缩而止付美国和加拿大银行集团总计为一亿美元的两张二至三月的续订合同时开始的。目睹印度尼西亚的信用处于危殆的境地,苏哈托坚定地采取了行动来挽救这个债务缠身的联合企业,以确保国家信誉。神经质的债主们的瞩目点在于,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关于承包一切珀塔明纳贷款和设法准时偿还其后一切债务的保证。

在后来几个月中,苏哈托认为有必要分别颁布几项布告和

命令来收拾珀塔明纳的混乱局面。这导致了彻底的改革。并不奇怪,从六月份一次使人目瞪口呆的会议上听到,仅三月份,珀塔明纳就欠了外国债款和过期的政府石油税款达三十二亿美元,再加上地方公司债务四百七十亿卢比(相当于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总计起来,它超过了一九六六年印度尼西亚继承的“苏加诺债务”。珀塔明纳的债务包括未付给政府的八亿五千万美元,十亿美元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即将清算的信用证,九亿美元的中、长期贷款,再加上已由印度尼西亚银行以珀塔明纳的名义在一九七五年还清的四亿五千万多美元。

今天,苏托沃依然驾驭着这只企业老虎,可是它已被政府紧紧地束缚住了。行政上的自决权已经暗暗地被剥夺了,这个权力曾允许他按自己的规定办事,随心所欲地进行新的投资。这一步不可避免地使珀塔明纳放松了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支配,无论是好是坏,它引起了以前作为一种发展力量的实质上无敌的神秘而奇异的幽灵的消失。这表现出官方技术治国派势力影响的抬头和一种政治上的胜利,他们对珀塔明纳只对总统负责,对其它任何人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耿耿于怀的。他们在苏托沃失败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展,使发展计划在委员会中有受到阻碍的危险,并造成一个无所作为的官僚机构。究竟危险如何严重,还有待分晓,但一定程度的缓慢发展则是毫无疑问的。

最重要的是,就权力而言,几个月前的签名还值百万金元的苏托沃,他的财政之翼已被重重束缚住了。实际上,国家的石油钱袋口的绳子已通过一个命令从苏托沃手中夺走了,这就是,今后一切珀塔明纳(以及其他公共事业企业)的借款须由印度尼西亚银行和财政部来掌握。珀塔明纳所有的信贷关系都给切断了。公司纷乱的金融事务都由珀塔明纳委员会的两位新的成员来负责:石油煤气开采局长维加索被任命担任首席董事这样一个新

职位，很明显，他成为珀塔明纳王国的第二号人物；财政部的预算总监，沉默寡言的陆军少将彼皮特·哈乔诺，接替了苏托沃的密友阿依多，担任珀塔明纳财政和行政管理处主任。他们与印度尼西亚银行总监拉奇玛·萨勒以及两位珀塔明纳的专员，财政部长阿里·华德哈那和采矿部长穆罕默德·萨德里配合密切。过去几乎被苏托沃夺去光彩的这个王国的五位部长组成的监督集团，也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珀塔明纳财政体制的这一主要变化，使印度尼西亚银行成为原油出口收入的印度尼西亚股份的直接受益者。这些资金将名义上列入珀塔明纳的账册，象过去一样，每季度纳入国库，可是新的法令使中央银行能够监督石油运输和确保政府收入的份额。在过去，当原油出售后，石油收入都存入珀塔明纳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银行中的账下。至于生产股份的收入，由珀塔明纳每季度作为收益项目交付给政府。这给予公司一个短期资金的额外来源，其中八亿五千万美元可以由苏托沃直接用于各种投资。

珀塔明纳最大的资金消耗是对喀拉喀托钢铁厂的投资，这笔投资计二十四亿美元，最后计划产量是每年二百万吨。这个西爪哇的投资也牵连着珀塔明纳该人的佣金和普遍的贪污（它的经理为自己造了一幢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寓所，再加上别的事情，在今年年初，被开除了），这件事情是受到政府最严密的调查的。随着化肥规划的出现，珀塔明纳不再照管喀拉喀托钢铁厂，而由省行政改革部长 J·B·苏玛林博士负担起这个责任，他的喀拉喀托委员会被认为在同德国商人重谈协议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功，使喀拉喀托的计划费用从二十四亿美元削减到十三亿美元，所以上个月他受托重新协商珀塔明纳尚未解决的国内外合同。其他预算委员会推迟了计划中的雅蒂巴伦化肥厂和巴丹岛精炼

厂，削减了南苏门答腊稻米种植园的规模。珀塔明纳内部的各种管理和决算的改革也正在进行，包括恢复一个预算委员会。

尽管财政上受到抑制，使他生气勃勃的发展努力销声匿迹，苏托沃看来仍保持着他的地位。情报局副局长阿里·穆托波陆军中将和前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都属于苏托沃的庇护者，珀塔明纳的首领也不让人们忘记他影响深远的行动总是得到总统的赞许和经常的鼓励的。他得到军队和穆斯林集团的广泛而可靠的支持，他们高度评价他的伊斯兰寺院建设，这是作为珀塔明纳周围的公共改革的一部分。在恰当的地方花些钱使他能够维持一个漂亮的门面，据说他付给三家雅加达的官方报纸的钱每月各有一百万卢比。

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苏托沃仍被许多人(包括苏哈托)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一位实业天才和很难取代的珀塔明纳行政首领。他在油田上和议事厅里同样都是胜任的，很少有印度尼西亚人能够同他的从井口到市场的石油行业专长相匹敌。为了获得财政上的自由，政府今年不得不重新筹集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此，苏托沃的作用便集中在资金运用、技术和其他非财政经营方面。看来，他在工作中保持了稳固的权力，但是，同时也能够最终看出是政府控制了珀塔明纳，而不是相反。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远东经济评论》)

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青年工人胡杰译)

## 野心勃勃的提高生产率计划

〔英〕R·哈略沃斯普特罗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亿三千二百万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以农业为生的。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必须给农业以特别的优先权。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增加生产以达到国家自给。一方面，必须使农民把种植水稻看作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农民的利益又不能给消费者造成过重的负担。因此，政府增加水稻生产的方针必须是在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政府增加水稻生产的努力，一般来说，通过两种途径：满足农民的生产需要和通过较高的米价增加农业收入。适应农民需要的主要计划是大众指导计划和大众加强耕作计划。

大众指导计划实际上是一种信贷计划，用来向农民提供资金，利息比历来由地方放债者规定的利息要低。主要是由于收入的季节性变动，农民们为了日常生活和种子、肥料及农药等需要，总是周期性地陷入急需现金的境遇之中。他们照例总是求助于放债者。这就是一般人称为“艾乔恩”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农民们把自己的作物抵押给放债者以换取现金。“艾乔恩”使农民在经济上日趋衰弱，这主要是因为农民为了自己的需要，结果不得不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大米。他们往往终于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土地。

当局为改善农业形势而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向农民提供

贷款，从而根除“艾乔恩”的活动。这种贷款即所谓大众指导计划的贷款，是通过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在农村贷放的，农民用它来购买肥料、农药、种子和农业设备等必需品。这种贷款提供的提高水稻生产的最新技术情报等农业服务项目支持了这种贷款计划。

大众指导计划虽然在理论上很吸引人，但一开始并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主要的不足之处似乎在于信贷发放制度。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农村分行只向农民团体而不向个体农民提供贷款。还由于农民在种植季节最需要贷款时，而贷款到达个体农民手里往往太迟，还有贷款发放中的漏洞，贷款额还有减少的情况，这样就无法消除高利贷者。

结果，许多农民还是不得不抵押掉他们的产品。为了建立农村分行与个体农民的直接联系，以后对信贷发放制度作了改进。

另一个重要的农业改进计划即大众加强耕作计划。它用于那些农民的资金较有保障的地区（这通常是由于大众指导计划推行的结果），用来分配必要的农业设备。

为了实行上述两种计划而创立的新的组织机构是乡村事业联合体和新近才成立的乡村事业合作团体。

对发展农业的计划来说，小的乡村被看作是基本经济单位和发展活动的首要的中心。

乡村事业联合体和乡村事业合作团体有四个作用：一、为农业的扩大耕作提供合格的农业工人。二、提供贷款。三、按官方固定价格提供生产必需品，如肥料和种子。四、提供加工机械（如脱粒机、脱壳机和烘干机），使农民可以加工自己的谷粒，以便获得较高的价格。

头几年，乡村事业联合体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

的问题是，这个计划在文化和社会结构差异很大的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被强制推行着。过分热心的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在强制推行发展计划时常常会遇到消极的抵抗。例如，在巴厘，传统的乡村体制实行着同乡村事业联合体基本相同的功能，而官员们试图以新的组织系统代替旧的体制时遇到了村民们强烈的反抗。但是，吸取了初期的教训，计划的推行得到了改善，乡村事业联合体的数目很快就增加了。

尽管大众指导计划和大众加强耕作计划早期有些问题，但通过乡村事业联合体的作用，在提高水稻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还是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见表一）。推行计划地区每公顷的平均水稻产量达到一般稻田的两倍左右。

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由于计划和组织的作用，还由于农民们愿意冒险接受贷款和试行计划，以及他们偿还债务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米价。为了提供米价稳定的必要基础，政府自一九七〇年通过决议规定了米价的固定的最低和最高额。

实行新计划前，米价经常有着明显的涨落。例如，根据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官方统计，在规定米价的前一年，单在爪哇，平均米价从收割季节（三月到七月）的每公斤二十八点五六盾上涨到非收割季节（十一月到一月）的每公斤五十点二六盾，上涨率为百分之七十六。对于那些在收割季节前被迫把谷物抵押给放债者的农民来说，米价的变化意味着在收割季节以低价卖出谷物，而在收割季节后为了家庭需要又不得不以高价买进谷物。

一九七〇年政府将有补贴金的肥料、大米和尚不稳定的 IB 型优质稻种的价格分别定为每公斤二十六点六十盾、十三点二十盾和三十六盾。这些基本价格成功地维持了三年（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

但是,由于一九七二年特别长的旱季,水稻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一,米价也因此而失去了控制。为了对农民保持足够的刺激,基本米价提高到每公斤十五盾。到一九七三年,基本谷价增加了两倍。三月份为每公斤十七点五十盾,五月份为二十一点二十盾。一九七三年形势开始稍有好转,五月份米价一直保持不变。最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率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到一九七四年三月间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米价才被迫涨到三十盾。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国家经济稳定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变限价政策的决定。由于维持肥料补贴而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决定逐步减少这种补贴,并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把肥料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为了使农民免受新的肥料价格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从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起将基本米价提高到每公斤三十一.八盾。大众指导计划的贷款合同也作了相应调整。

决定宣布后的最初两星期内,米价明显上涨,但到第三个星期,局势就成功地控制住了。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当局面临的问题是米价反而降低到基本价格以下。

一九六九年以来水稻生产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证明,水稻产量每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四到百分之七.二(见表二)。如果没有自然灾害和因病虫害而引起的严重歉收,估计水稻总产量一九七五年可达一千五百六十三万吨,一九七六年可达一千六百三十八万吨。到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印度尼西亚的水稻产量有希望达到一千九百万吨,实现稻米自给。

这个估计建立在假定每年生产增长百分之四点四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四方面的发展可以使它成为现实:一,在水稻种植区建设新水坝和水利灌溉网;二,开垦海滩,扩大水稻种植区;三,有限地、试验性地引进南苏门答腊的稻种;四,发明新的抗病

稻种如PB20。有了这些补充的因素,印度尼西亚在一九七九年满足国内对稻米的需要将是完全可能的。

表一

水稻生产的增长(100 镑/公顷)		
年 份	推广计划地区的平均数	
	大众指导计划	大众加强耕作计划
1969	38.14	36.28
1970	44.98	41.92
1971	44.23	39.45
1972	49.38	43.48
1973	51.26	45.56

表二

一九六九年以来的水稻产量
1968—11,666,000吨
1969—12,249,000吨
1970—13,140,000吨
1971—13,724,000吨
1972—13,183,000吨
1973—14,607,000吨
1974—15,452,000吨

(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远东经济评论》 上海  
第五钢铁厂青年工人施德祥译)

## 寂静舞台上的“独脚戏”

〔英〕D·科金

过去的一年里，在印尼的政治观察家并不是十分忙碌的。那个由千疮百孔的军事帷幕遮盖的一片黑暗的政治舞台上，很少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東西。印尼的政治，同十年以前一位夸夸其谈的独裁者在手执皮鞭的将军，以及学生、共产党和一大批背后嘀咕的其他党派中间进行表演时的那种乱哄哄的情景相比，显得出奇的寂静。

如今，将军们控制着一切，并和高级阶层的同伙一起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对于这些同伙过分的挥霍，他们不时出于责任感也训斥几句，但他们自己是不会受到广大的、仍然衣衫褴褛的贫困群众监督的。学生们因为害怕而沉默了，他们的骚动，近来已不如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屠杀以后转入地下的残余共产党活动得那么频繁了。其他几个早就变得顺从胆小的政党，今年已被压缩成两个更容易操纵的团体。

这就是使印尼非政治化的广泛的军事政策的全部内容，它似乎还在起作用。至于说这种局面意味着这种政策是有效的还是明显地是愚蠢的呢？这要看人们的观点了，但是，不管怎样，外界的观察家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团体一样，特别是在从非政治化了的人民中勉强发出一点呻吟的时候，几乎近于麻木状态。如果在这一片静默中还有什么不祥的低微之声，那也是难以觉察得到的。乡村的生活保持着原始的宁静。甚至在雅加达和其他

城市里,在那里金钱和特权造成了印尼社会深刻的裂痕,也只是偶然地,或者从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暗示中感觉到紧张。

所有这一切给政治舞台留下的,除了苏哈托总统这位唯一的铁腕人物外,实在是一片空虚。在他掌权近十年的今天,他不仅比以前强壮,也更加不想退隐。他依然显得有点拘束,但经常带着微笑。他意识到自己是统一着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但却缺乏印尼人所喜爱的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和雍容大度的气质,尽管他作了各种努力,而他仍然是一位蒙着薄薄伪装的军事独裁者。无论是将军还是文职官员,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是认真地反对苏哈托的。但是,今年他在处理两次危机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他取得了强硬地位,从而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有兴趣的观察。在这两次危机中,他刚毅地毫不动摇而又带着爪哇人的机智,再次显示出他是掌握着印尼政局的。

今年早些时候,当珀塔明纳国营石油公司因负债而发生困难,不得不由中央银行来帮助它摆脱困境时,苏哈托坚决提议要限制该公司的头目,也是他原来在军队里的同事,中將伊卜努·苏托沃博士的财政费用。据有些人的估计,此人与苏哈托本人一样有势力。总统既没有斥退也没有罢免苏托沃,只是剥夺了他的财政大权,并且为时已晚地恢复了政府对珀塔明纳的控制。

在葡属帝汶,两个月的内战已把四万名难民送进了印尼,并提出呼吁,特别是呼吁他的高级将领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关于这个问题,苏哈托坚持用煽动游击抵抗的间接方法,目的在于使这个殖民地逐渐并入印尼。过去的两年里,苏哈托总统在这些和其他政策问题上,已较多地亲自参与了细节决定的拟订工作。

这种亲自参与表明：苏哈托丝毫没有丧失他在印尼行政之上的地位的令人畏惧的力量，也没有损坏一点他外表上完全的自信。在争取一九七七年第三个五年任期中，估计没有人能向他挑战。苏哈托没有宣布过他是否将接受“人民协商会议”对他的再次提名。但是事实上，政界的每个人都认为他将再次成为唯一的候选人，现在他正致力于再次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

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发生的两天反日暴动，当时刚好是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雅加达。即使这是迄今为止七十年代的政治分水岭，现在也没有人再多谈了。大学生和雅加达报纸在过去几个月里变得难以驾驭起来，这种骚动明显地部分是出于自发，部分是政治上的激动，这都使苏哈托箝制大学生和报纸有了充分的口实。哈里曼·西雷加和另外两名学生从那时起就被判处平均六年的监禁，另外十三人仍被拘留着，或有待审讯，或于一九七五年三月被释放了出来。最近有十一人获释，有些人对于他们不加审讯而被拘留近两年一事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抨击。一些雅加达报纸发表了他们某些批评性的评论从而成功地投了一次机，这一切都标志着这种箝制正在放松。从印尼平静发展的事态来看，要获得较充分的自由，似乎只需苏哈托冒点极小的风险就行了。政治舞台实际上都是属于他的。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远东经济评论》 何积惠译)

## 俄国发现了麦迪逊大街<sup>①</sup>

〔美〕《商业周刊》

在莫斯科的时髦的加里宁大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最近顿开茅塞，因为她们向百货商店的橱窗瞧去时，看到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穿着睡衣，正往裸露的长腿抹着进口的净肤剂。一位到该市来访问的美国律师对这种转变很高兴，说：“这同我过去所了解的莫斯科两个样了！”

商店里的展销员把女性的魅力和招徕生意的样品结合起来，这仅仅是俄国人新“发现”的几种西方式做买卖的技巧之一。消费者分期付款的办法，从前只为电冰箱之类的高档商品提供，现在已适用于低档价格的电视机和诸如床单和衣服之类不贵的商品了。至于广告，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实际上苏联人是不懂得的；而今，估计每年在广播时间和书刊的版面上已花费了大约五亿美元。

他们全力以赴地增加经营更好的商品，使苏联公民把他们增加着的储蓄花掉一些，并鼓舞人民的士气以刺激工厂里落后的生产力。商业市场研究所所长兼内贸部部长列昂尼德·F·斯托尔莫夫认为：“做广告的目的同竞争性产品进行竞争无关。”更确切地说，这是为了去创造一种需求，特别是对新式商品的需求。一九六六年，在部长会议确定建立一个政府办的广告机构

<sup>①</sup> 麦迪逊大街是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街，美国广告业中心。本文题目的意思是今日苏联步美国后尘，也搞起资本主义商业广告来了。——译者

后不久，总理柯西金说：“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是进一步成功地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

尽管斯托尔莫夫作了上述的声明，由于西方做广告的办法证明是有效的，各个工厂经理和零售者们日益关心的不仅仅是造成一个始终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还有在销售时如何对付竞争。例如，在明斯克，生产“地平线”牌电视机的工厂经理表面上看似乎与销售问题不搭界，因为他的电视机的销路又好又稳定。但是，如果他增加生产会有什么后果呢？在苏联，生产没有销路的商品不只是使人为难，而且恼火的生产者还得向政府交纳罚款。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经理就在《商业公报》上登广告，这是一份报道市场交易的版面十分漂亮的杂志，它的发行量已从两年前的两万五千本增加到目前的四万五千本。

《商业公报》用约一千六百美元的要价售出它的封面，以刊载题为“今年的新型产品——地平线牌 107 型”电视机的图片。而这份杂志中的三页，要价为每页八百七十美元，以类似的推销商品的诱人语句，介绍地平线牌其它型号电视机的特色。据这份杂志说，104 型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头等电视机”，这种自吹自擂，也许会使莫斯科的一家生产商标名为“鲁宾”牌电视机的工厂经理冒火。作为一种特别刺激，这则广告还指出 104 型已经得到“质量合格证”——判定是优良产品而发给的一种封签。

全国商业广告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基赛耶夫说：“我们正尝试使我们的广告更有吸引力、更有效。”越来越多的客户花费二十万美元之多，从多种渠道，包括电视和电影院的广告节目、报纸和杂志广告和广告小说等来推销商品，有时甚至由演员出场来称赞商品。

基赛耶夫的机构为莫斯科一家钟厂的新的竞争搞出比较传统性的广告。电视广告里出现了一个苏联家庭，每个成员都因

闹钟的铃响而苏醒了。同样的家庭还出现在许多介绍诸如鱼子酱、衣料和洗衣机等其它产品的“专题”广告节目里，在莫斯科的电视中，所有的介绍(每个专题只播送三分钟左右时间)都放在单独的十五分钟一档的节目里。

苏联的厂商懂得：在电视里做广告有人看。不管这种广告看来很呆板单调，他们还是吵吵嚷嚷地要求播送更多的广告节目。伏罗内兹赫的工业城市有两个商人敦促国家电视当局“限制利用节目空档时间”，例如不要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中间穿插播送朴素的音乐。他们要求以广告节目代之，这个主意赢得了胜利。

有些增加广告的压力来自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特别是爱沙尼亚。这个加盟共和国已经完全沉浸在它的斯堪的纳维亚化中。爱沙尼亚广告影片制片公司为苏联的电视和电影院制作动画广告片，并且承接芬兰、瑞典和挪威商人的制片定单。其它的压力则是因社会主义国家向俄国出口消费品而想使他们的产品得到畅销而引起的(例如莫斯科那家商店的橱窗模特儿所展示的净肤剂就是从匈牙利进口的)。

苏联做广告人士仅仅说工业在最近几年已经增长“几倍以上”，这表明三十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几百个工厂和许多零售商都要求为他们的货物和服务做广告。但广告也遭到某种反对，如化学工业部一个助理曾抱怨某些厂商“当我们需要钱去改进工厂设备的时候，甚至在为销售洗涤剂而录制唱片”。——这种趋向已经引起有关做广告为了什么目的和是否明智的相当大的争论。要不要形象地反映新工业的发展，是争论的主要内容。一本新的商业杂志《广告》为“斯皮道拉”牌的半导体收音机征求形象化的产品商标一事辩护，说电视机有“黎明”、“白桦树”和“泉水”等牌名，而“斯皮道拉”牌半导体收音机只有“BEF-10”和

“BEF-12”这种技术型号名称。

偶尔,在俄国甚至也为所谓的亏本商品如汽车、销路极好的彩色电视机和蓝布工装裤做广告。这些商品是人们所需求的,所以,平常时候货一到商店就卖光了。市场研究所的斯托尔莫夫说:“如果我们让价格提高,我们就不会有亏本的货物了。但是,我们的价格是保持稳定的。”为了使消费者确信他们等待已久的商品最终将出现在商店里,搞一则简短的广告有时还是必需的。

在越来越多的引人注目的广告的推动下,俄国的消费者目前正利用政府向他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仅电视机一项,据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经济分析家估计,欠款已约有两亿八千万美元之多。

除了靠广告和信贷促进消费者花钱外,苏联政府还采用其他措施,敦促美化包装以提高产品的价值,并要求加强对市场的研究。斯托尔莫夫说,因为他们已经懂得:“统计数字总是不够的。”厂商已不仅仅依靠粗略的数字,还正利用试销和产品展出等,凭直觉判定市场动向,以帮助形成消费者的爱好和兴味。有时,他们恬不知耻地借用西方的办法,引用莫斯科的麦迪逊大街式人物的话来说:“那里(西方)卖什么这里也卖什么。”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美国《商业周刊》 上海  
玩具十七厂青年工人秦博译)

## 更多的波兰人涌向私人经营

〔美〕M·W·布朗

尽管共产党已统治了三十年之久，波兰私人经营活动的残余阵地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显示出有所复兴的迹象。

政府默认，私人经营的单位比共产党的国营企业能更好地和更有效地提供许多产品和劳务。在目前致力于优先改善波兰人民生活质量的政策下，政府正鼓励私人进行经营活动。

到去年年终，私人经营的单位雇有四十万名波兰工人，另外有六万二千名艺徒，而在一九六〇年，私人经营的单位仅雇工二十五万一千名。

大量的波兰工业产品仍然来自国营工厂，而且波兰的领袖们也无意回复到“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但是，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这种想法由于要考虑从实际出发而日益淡薄了。

无论如何，以罗马天主教徒占压倒优势的波兰人民从来没有接受过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在苏联集团其它东欧国家都致力于集体化的时候，波兰的集体化过程则在一九五六年，即在斯大林逝世后开始自由化时，就停止了，因而今天波兰农地的百分之七十九仍在私人手里。

与此同时，私人小作坊的工匠们正在使自己越来越适应于共产党制度下总的限制规定，他们是在不断地增加他们的产值。

去年,这些工匠经手的营业额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本报记者访问了许多波兰工匠,发现他们都认为真正的高超技艺只会出自私人经营的生产活动,而不会出自国营工厂的生产活动。

四十岁的马车制造商米哈尔·博加耶维奇是当前仍以技艺高超为荣者之一。他的工场设在华沙以西二百英里波兹南省普涅韦村他家的后院。

目前由博加耶维奇经营的家传的马车制造事业,是由他的祖先于一六二〇年时在距普涅韦不远的地方创立的,从一九一一年起迁至现址。

几世纪以来,这个马车制造事业要对付波兰的沦亡、长期遭受外国占领、汽车发明后马车制造业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的到来等各种问题。

大战前,这个家传的马车制造事业雇工达二百人之多,现在雇工只有二十人了,然而在共产党国家中,私人雇主即使雇用这么多的工人也是异常大的数目了。

除了恢复生产一些供旅游者在华沙使用的、或者为波兰博物馆展出用并能在国际市场中角逐的古式马车以外,博加耶维奇的事业年产新马车约八十辆。某些马车供国营农场的官员们在农场范围内来往使用;有些供狩猎者使用,因为马车在森林中比机动车更为实用;另外一些则是装潢得别出心裁的阔绰的柅车。

这个企业的铁器工人、家具木工、坐垫装潢工和漆工等都整天有工作做,很少有人离职他就。

博加耶维奇说:“我们在这里干着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早已被忘记了的一些事情。

“我们学会了仿制那种不能用现有料子替用的古老纺织品。

我们学会了如何使当地所产的皮革和木材适用于我们的这一行业，即使那些木材经常是第二次大战中为炮弹弹片破坏过的，而那些皮革也确得质量很差。我们是热爱我们的工作的。”

最近一天下午，博加耶维奇先生在同两位友人喝咖啡时谈起了他的工作。

一位是安德伦夫·赫拉波弗斯基先生，是译员，在波兰外交部的一个机构当临时译员。赫拉波弗斯基先生现在华沙过着很俭朴的生活，但在共产主义来到波兰以前，他的拥有土地的有权势的家族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西部波兰的许多土地。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博加耶维奇家族是一直为赫拉波弗斯基家族造马车的。

应邀一起喝咖啡的另一位是普涅韦村委员会主席埃乌根尤什·希德洛弗斯基，他有着赫拉波弗斯基家族过去所拥有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

这个马车制造商说：“不论国家有哪样的政府，或采取哪种制度，这些都关系不大。任何政府都需要和欣赏有手艺的人。波兰实行社会主义以来，我们不是经常轻松愉快的。

“但在波兰，一个人必须懂得怎样找人帮助。我是懂得怎样找人的。你能够在你的周围的一个小范围内结交一些朋友嘛。”

贵族出身的赫拉波弗斯基和共产党官员希德洛弗斯基都哈哈大笑，对此表示同意。

另外一位乐观的企业家是六十八岁的私人机床制造商弗拉迪斯拉夫·西科夫斯基。他是金属制造工人全国行会的主席。

波兰的行会制度本身是封建时代的残余。今天，波兰的各种行会起着行会成员同政府间的中间人的作用，而全部私人雇用的工匠必须隶属于行会才有工做。

西科夫斯基拥有一所工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雇有

工人三十名，而今天他仅雇工六人。

波兰的私有企业受三个方面的限制：雇用工人数量（超过规定时，实行高额捐税），工场规模在法律上的限制以及原料的配给。

尽管有这样一些限制，西科尔斯基先生的事业能每年供应国营家具工业使用的一吨的刨木机十五台。他的工场还生产水力压榨机、塑料压模机和其它一些复杂的机器。

西科尔斯基先生说：“我场产品的质量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所产的全部机器都是由我设计的。政府承认我们的重要性。此外，私人工场利用的原料是国营工厂的废料。我们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助手嘛。所以，我们能生存下来。”

一位四十岁的同行布古斯拉夫·沃伊齐克经营一个世代生产医疗仪器的家传事业。

今天，沃伊齐克先生只雇用四名工人和一名艺徒，他的工场每年生产七千个质量极其优良的听诊器，其中许多是出口西方国家的。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美国《纽约时报》 辛斐译）

## 西方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

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一九七三年秋季起,出版有关苏联和东欧研究方面的丛刊。由小查尔斯·施拉克斯负责主编。

这套丛刊,共分六种:

(一) 俄国历史。包括从中古、帝国到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方面的稿件。

(二) 苏联历史。有关苏联社会科学和近代史的资料,包括各种民族和少数民族。

(三) 中欧和东欧。有关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四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稿件。

(四) 东南欧。有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稿件。

(五) 拜占廷研究。有关拜占廷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资料。

(六) 美国和加拿大有关斯拉夫的研究。它是美、加两国间的学者、机构和出版界共同研究苏联和东欧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协作成果。

除第六种是季刊以外,其他五种都是年刊。

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附设有“苏联东欧研究所”。在英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学会的赞助下,该研究所主编并出版《苏联东欧书刊文摘》(季刊,英文简称 ABSEES),每期刊载苏联和东欧书报杂志的文摘一千条以上。

苏联东欧研究所还在出版一套有关东欧国家工业中经济改革的丛书。由亚历克·洛夫和贾纳斯·G·齐林斯基负责主编。其中有:

伊恩卡·施皮克勒:《罗马尼亚》。

贾纳斯·G·齐林斯基:《波兰》。

理查德·波特斯:《匈牙利》。

格特·莱普廷和曼弗雷德·梅尔泽:《东德》。

奥尔德里奇·凯恩:《捷克斯洛伐克》。

杨波·瑟克:《南斯拉夫》。

乔治·菲韦:《保加利亚》。

格拉斯哥大学还出版一种《苏联研究》(季刊), 现已出到第二十八卷, 主编是亚历克·洛夫。

(学 铠)